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12月31日第33期 总第243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43期

目录

【编者按】

人亡政息，文化仍在

【红色文化研究】

李 潔 发现中国的红色遗产

——《中国的红色遗产：共产主义革命的文化来世》导言

【红色文化译介】

度关山 李海燕的红色遗产研究

——《毛泽东的两个身体：关于扮演伟大舵手的奇特艺术》

【红色文化解读】

王克明 联合体里的“自由”是集体主义能力——重读《共产党宣言》

啟 之 红与黑：毛泽东时代的新文化——电影中的正反人物

【书摘】

何 方 毛泽东的外交指导思想（一）

【何與懷评论】

1. “碰瓷”：这个“专利”不光彩

2. 如此国师：胡鞍钢成了众矢之的

3. “川普现象”与“历史的钟摆”

【述往】

韦文德 一个地主崽的一生（三）——儿女的求学与父亲的药担

梁沪生 独酌翁杂忆——右派分子老王头·头号走资派

【本刊声明】

【编者按】

人亡政息，文化仍在

毛时代貌似远去，但其精神仍旧鲜活：梁家河取代了韶山冲，“十年浩劫”变成了“艰难探索”，歌德效忠继续奏响主旋律，革命传统提升为文化软实力，昔日的无良政治带来了今天的无信经商，梁效臭了，贾桂吃香；乌托邦走了，中国梦光临……。

今年第一期（211期，2018/1/15），本刊发表了《重新寻找立足点——文化清理与文化重建》一文。文章说：当下要做的首先是文化清理——重新评价“红色文化”。弄清楚哪些是普世的，哪些是一党的。清理是为了立足，有了立足点才能谈上文化重建。

今年第五期（215期，2018/3/15），本刊发表了《什么是红色文化》一文，文章认为，红色文化是一个含混、复杂的概念，它既不是单纯的党文化，也不是所谓的“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而形成的文明总和”。文章提出，第一，要防止人们用“文明总和”来掩饰红色文化中的党派性。第二，不要因为红色文化中包含许多消极因素而无视其中的普世价值。第三，“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一直把消极因素当作积极因素来坚持和强化。”（何方）

上述二文发表后，鲜有回应。原因之一是相关的思想资源匮乏。因此，我们决定求助于“外援”——本刊第235期（2018/9/30）发表了德国汉学家文浩（Felix Wemheuer）《饥荒政治》一书的前言、终章与结论，并配发了陆凌的书评。第237期（2018/10/15）发表了傅蕾对保罗·克拉克等人主编的《中国文革：音乐、政治与文化延续性》一书的评论。本期刊发的哈佛大学李洁的《发现中国的红色遗产》和斯坦福大学李海燕的《毛泽东的两个身体》，皆出自《中国的红色遗产：共产主义革命的文化来世》一书，此书是近年来西方学界关于红色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

我们从这一期开始设立“红色文化研究”、“红色文化译介”和“红色文化评论”（解读红色文化，评论相关著述）三个专栏。冀望借此专栏多多刊发关于红色文化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见解和新知识，以推动国内的相关研究。 

【紅色文化研究】



作者簡介

李潔，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的人文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電影和媒體的研究，著有 *Shanghai Homes: Palimpsests of Private Life*（《上海人家：重書回憶》），在電影和中國研究期刊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並在中國和非洲拍攝過紀錄片。

《中国的红色遗产：共产主义革命的文化来世》导言¹

发现中国的红色遗产

著：李潔/譯：度關山²/校：啟之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在这个荒谬的时代，他们鼓励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励你闹革命。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2011

在今天，中国的学童们在学校依然需要高唱革命歌曲《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那么，共产主义革命为今日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呢？³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些纪念活动似乎把最近同时在官方和民间复兴的、所谓“红色文化”推向了高潮。其中，与共产主义革命有关的文化文物被改造为“红色经典”、“红色歌曲”、“红色艺术”、“红色收藏”、“红色餐厅”和“红色旅游”。然

¹ 此書英文書名：*Red Legacies in China: Cultural Afterliver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由李潔（Jie Li）張恩華（Enhan Zhang）合編，由哈佛大學亞洲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6年出版。張恩華系馬薩諸塞州，阿默斯特文理學院（Amherst College）亞洲語言與文學系副教授。

² 度關山系留法博士，英法雙語譯者，自由撰稿人。

³ 完整的英文版歌詞，參見：<http://www.chinese-tools.com/songs/song/68/shaonian-xianfengdui.html>（最近登錄時間：2014年6月20日）

而，经过将近四十年的市场改革和社会转型，毛泽东时代的思想、现实和记忆，在多大程度上还依然有着影响力？“革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实践，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革命历史”的哪些方面和层面被美化、质疑或者否认——以及被谁，如何，何时，为何？

本书的诸位撰稿人研究了中国的红色遗产（译注：本书中的红色遗产，与后文中出现的红色文化遗产是同一概念）——后毛时代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遗留和暗示。红色遗产能够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公共文化的残余中被发现，以及对革命过去的当代重现和重建；美学形式、实践和思维模式的传承——它们都唤起了人们对乌托邦理想和创伤性灾难的回忆。以遗迹、文物、文本与图像、身体与场所为中介的红色遗产，对中国人的身份从社会主义时期到后社会主义时期的连续性和转变提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不仅关乎当下如何记住过去，也关乎过去如何塑造现在——革命道路上的思想、象征和牺牲如何成为中国社会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的资源或者负担。本书中的各篇文章将重新审视、分析和评论各种文化形式的红色遗产。

我们如何为红色遗产划定年代？中国的红色文化可以追溯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从井冈山到延安的共产主义根据地的建立，但是直到1949年，中共的政治取得胜利之后，早期几十年的革命动员才进入了主流文化，成为了神话、传说和遗迹；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前，这些反过来又在“继续”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换句话说，1949年之前发生的革命斗争已经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间重要的遗产。虽然我们对“革命历史”的定义包括1949年之前的时期，但本书所侧重的还是1949年以后的主流文化，包括博物馆、艺术作品、戏剧、文学和电影中对革命历史的构造，以及对后毛时代的影响。与前苏联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不同，中国从未经历过明确的政权过渡——无论是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还是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始终维系着它的独裁统治，但是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无法掩饰中国放弃共产主义理想、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现实。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文化和制度要么完全消失，

要么以残余的形式存在，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擦除或者复兴。近年来，红色文化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带领下进行了本地化的官方复兴，直到2012年春天他在万众瞩目中失去了自己的权柄之前，他提倡传播毛主义的口号和唱红歌，以调动和利用大众的情绪。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有选择性地回顾1949年之前的革命斗争的同时，对毛时代也进行了“选择性失忆”。虽然在1981年的决议中，中共正式将文革定性为内乱，然而教科书、博物馆和官方媒体都回避了这十年的创伤记忆，以及其他敏感的历史阶段，如“大饥荒”和“反右”。因此，毛时代仍然是一个不稳定的争论点，既可以支持也可以威胁到当前政府的合法性。当代中国与红色遗产之间矛盾的、甚至是精神分裂的关系，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的题词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他们鼓励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励你闹革命。”¹

在知识分子话语和流行文化中，红色遗产也充满了矛盾和含混的意义。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的十年中，文革成为了文学、艺术、电影中的重要主题，产生了诸如“伤痕文学”、“寻根”运动等文学和文化运动。²然而，过多的非官方历史虽然为过去的苦难提供了一个宣泄口，却仍然处于审查的阴影之下，并且从未涉及过集体犯罪和责任的关键性问题。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一场毛崇拜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对历史的无知，民间的信仰，以及对市场改革的幻灭都促成了红色收藏的大规模商品化，文革歌曲用摇滚乐的节奏被翻唱，红色艺术转换成政治波普(Political Pop)和商业广告，以及大量红色主题餐厅和红色景点的出现。³1990年代同时也是“新左派”公共知识分子出现的年代，他们批判政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造成了不平等，并试图让毛泽东思想复苏。自从21世纪初以来，他们的观点以

¹ 摘录自何兵副院长2011年一场非正式的毕业典礼致辞。这句话在中国广泛流传，也被西方记者大量引用。有关该演讲的视频，请参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u2tlRMsiBU>（最近登录时间：2014年6月20日）

² Michael Berry, 《疼痛史：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中的创伤》（*A History of Pain: Trauma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第4章；Sabina Knight, 《时代之心：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道德能动性》（*The Heart of Time: Moral Agenc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6，第6、7章；Yomi Braester, 《反对历史的证词：20世纪中国的文学、电影与公共话语》（*Witness against History: Literature, Film, and Public Discours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第5、6、9章。

³ Geremie Barmé, 《毛泽东的阴影：伟大领袖的身后崇拜》（*Shades of Mao: The Posthumous Cult of the Great Leader*）纽约州阿蒙克市：M·E·夏普出版公司，1996；Jennifer Hubbert, 《革命是请客吃饭：当代中国的文革餐厅》（*Revolution Is a Dinner Party: Cultural Revolution Restaura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载《中国评论》（*China Review*）5，第2期，2005，第125-150页。

及他们的反对者，即自由主义的观点在互联网上吸引了热切的支持者和尖锐的批评者。¹

记忆的文化场所

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四十年，基于个人亲身经历的记忆正在被文化和媒体取代。本书所关注的红色遗产指的是集体记忆理论家们所称的“记忆场所”或者“文化记忆”，而不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亲身回忆。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哈（Pierre Nora）创造了“记忆之场所”（lieux de mémoire）这一术语，用于指定构成法国民族身份的地理位置、历史人物、文学或艺术作品、符号和象征的集合。他认为，这些纪念场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记忆之环境”（milieux de mémoire）已不存在了，或者说记忆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²在类似的对比中，德国学者杨·阿斯曼（Jan Assmann）区分了“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前者由非正式的日常互动构成，后者则被写入了神圣的文本，成为了符号、仪式和叙事。³苏珊娜·魏格琳-施威德齐克（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将阿斯曼的理论应用于当代中国，她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史学基于那些被编辑和出版的“神圣文本”，比如《毛泽东选集》。因此，不仅是遥远的历史，而且近代的历史也被视为国家文化记忆的一部分。⁴同样地，将诺哈和阿斯曼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背景下，最近出版的《现代中国的文化场所》（*Places of Memory in Modern China*）一书考察了现代和当代中国的几个重要的记忆之场所，从秦始皇兵马俑到中正纪念馆。⁵

虽然“文化记忆”与“记忆场所”是我们立足当下理解过去的重要坐标，但上述概念

¹ Merle Goldman, 《从同志到公民：中国政治权利的斗争》（*From Comrade to Citize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马塞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Gloria Davis, 《担忧中国：中国批判语言调查》（*Worrying about China: The Language of Chinese Critical Inquiry*），马塞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Wang Hui, 《革命的终结：中国与现代性的限制》（*The End of the Revolution: China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纽约：维索图书，2009。

² 参见 Pierre Nora, 《在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场所》（*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载《代表处》（*Representations*）26, 1989年，第7-25页。

³ Jan Assmann, 《交流与文化记忆》（*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载 Astrid Erll 与 Ansgar Nünning 主编：《文化记忆研究：国际与跨学科手册》（*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纽约：德格鲁伊特出版有限公司，2008，第109-118页。

⁴ 参见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寻找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流叙事》（*In Search of a Master Narrative for 20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88, 2006，第1070-1091页。作者并没有将官方史学当作文化记忆的形式，而是将有争议的非官方史学——比如回忆录或者历史纪录片——视为“交流记忆”，它“最终变得可见并且要求被给予自己应得的位置”。

⁵ Marc Andre Matten 主编：《近代中国的记忆场所》（*Places of Memory in Modern China*），莱顿：Brill 出版社，2012。

中隐含了对单一文化传统、国族身份与历史主导性叙事的假设，相对忽略对过去的争议和多元记忆。因此，我们建议用“红色遗产”这一概念来批判与阐释毛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官方与非官方的文化产物。本书调研了过去与当下的隐秘“交易”，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红色遗产”在历史的各个阶段被不断重写、涂抹的过程。

置身于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本书主要基于——但是也区别于——旨在实现以下三个目标相关的学说：揭露或者确立历史事实；展示不同的社会群体如何回忆中国革命和毛时代；考察在电影、小说和艺术中的、过去的当代呈现。¹我们并不是要挖掘在中国“革命的几十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研究过去在现在的意义，或者过去对现在、为现在所做的事情。²我们并不是要回忆第一手的经验，而是询问可以代代相传的是什么，以及被压抑但依然继续施加影响的是什么。³除了文本分析，我们也追溯红色文化的生产和受众，以及它们如何成为象征资本和文化资产⁴。最后，目前为止学界对中国“后社会主义”的讨论集中在全球资本主义以及对其不满的情绪，而没有考察其遗产和债务，以及“革命历史”可能留下来的生命力和后遗症。⁵

¹ 很多论文集都汇集了这三种研究方法，例如，Ching Kwan Lee 与 Guobin Yang 主编：《重新构想中国革命：改革时代中国集体记忆的政治与诗意》（*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William C. Kirby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周岁：国际评价》（*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60: 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11。

² 这一领域一些代表作品包括，Joseph W. Esherick、Paul G. Pickwicz 和 Andrew G. Walder 主编：《作为历史的中国文革》（*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6；Roderick MacFarquhar，《毛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Paul Clark，《中国文革：一段历史》（*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以及 Chang-tai Hung，《毛泽东的新世界：共和国早期的政治文化》（*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1。

³ 两项关于社会记忆的深入研究分别是，Lisa Rofel，《另类的现代性：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性别憧憬》（*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Gail Hershatter，《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与中国的集体过去》（*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1。另一项将口述历史与毛时代文化艺术品的深入解读结合起来的研究，是 Barbara Mittler 所著的，《继续革命：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文化》（*A Continuous Revolution: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剑桥：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12。

⁴ 对于革命过去的后社会主义文化表征的研究，包括 Ban Wang，《过去启示录：现代中国的创伤，记忆与历史》（*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 Trauma, Memory, 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Braester，《反对历史的证词》（*Witness against History*）；Jiang Jiehong 主编：《负担还是遗产：从中国的文革到当代艺术》（*Burden or Legacy: From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Contemporary Art*），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7。

⁵ 参见，例如，Sheldon Lu，《中国的现代性与全球生物政治学：文学与视觉文化研究》（*Chinese Modernity and Global Biopolitic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Visual Culture*），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7；Jason McGrath，《后社会主义现代性：市场时代的中国电影、文学和批评》（*Postsocialist Modernity: Chinese Cinema,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in the Market Age*），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Xudong Zhang，《后社会主义与文化政治：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8。

本书中的各篇文章都强调了现在对过去的债务，以及过去在现在的复苏。我们不企图捕捉某一特定时期的“时代精神”，或者记载历史时期是如何以一种宏大的、目的论的方式相互接替的，我们分享了一种分层的方法，借鉴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方法。¹这种方法阐明了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谓的“主流”、“残余”和“冒现”形式之间的关系。²本书的作者们并没有将红色遗产视为超历史的常数，而是挖掘了文化记忆场所的分层层次，以追踪革命符号和神话最初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它们的形式和意义是如何变化的，以及过去几十年以来，它们是如何被不同个人和群体所动员的。作为仍然“活着”的残余形式——而不是与之相反的，死亡的、“过时的”形式——红色遗产可以对当代主流文化提供支撑，同时也可以进行批判。

除了更明显的那些红色遗产，比如“红色经典”和文革宣传画，我们还试图探索那些“看不见的”红色遗产，比如极权主义美学和思维习惯，以及革命如何以人作为代价——其中包括自愿和被动的牺牲，这就涉及到我们是否从理论与实践、意识形态与经验之间的析取中学习、学习了什么、如何学习的问题。有时，对于某些记忆的抹杀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遗产，表明了过去并不是非常过时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政府、主要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在塑造过去在现在中的意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红色遗产同样存在于抵抗或者超越官方的压制和表述的另类区域。

本书关注的并非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制度遗产，而是文化领域中的红色遗产，包括视觉和表演艺术、文学、电影，以及建筑、博物馆和纪念馆的相关章节。除了运用批判理论和撰写新的文化史之外，本书的作者们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包括档案研究、艺术历史访谈、图像和文本的深入解读，以及民族志的深描。通过关注共产主义革命的文化来世，

¹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纽约：万神殿图书，1972；以及《尼采，系谱学，历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载 Paul Rabinow 编辑：《阅读福柯》（*The Foucault Reader*），纽约：万神殿图书，1984，第76-100页。

² Raymond Williams，《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第121-127页。

这本书与最近出版的、由韩博天 (Sebastian Heilmann) 和裴宜理 (Elizabeth Perry) 合编《毛的无形之手：中国适应性管治的政治基础》(*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不同，那本书考察了中国革命的经验 and 遗产对当代政治制度和政策风格的影响、通过“适应性专制主义”解释共产党政权的复原力并且引起人们对“毛泽东的看不见的手”的关注。¹ 鉴于社会科学家们已经通过定义能够解释 (并且可能预测) 更大的政治和社会模式来研究革命记忆，本书的作者们对文化现象和知识潮流的微妙差别和复杂性提供了批判性解释。而虽然社会科学家们更重视分类、统计和科学分期，我们却更加关注媒体与流派，红色遗产的诗学和美学，它们不仅“引导和限制记忆的清晰度”，还参与塑造了当下和未来的社会实践。² 本书收录的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红色奠基”、“红色艺术”、“红色经典”、“红色身体”和“红色阴影”。下面是每个部分的介绍，以及各个章节的概要。

红色基础

在进入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来世的讨论之前，本书的第一部分讨论了红色遗产最初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纪念活动，后来成为红色遗产的文本、图像、文物和遗迹被召唤出来，在社会主义的时代，它们通常是一丝不苟的、浮夸宏大的建构，对过去的神话化如同对未来的预示一般。本书的前两篇文章将我们带到幕后，追溯某些社会主义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自我表征的建构。它们表明了，政治领导人负责监督重大项目，比如1950年代初期对第一次党代会会址的发掘和“博物馆化” (第1篇)，以及1950年代后期的北京十大建筑的建造 (第2篇)。反过来，“文化官员”和“文化工作者”——从博物馆工作人员到建筑师——实现了他们的愿景，他们经常作为团体协作而不是单独地工作。经过仔细的商讨和多次修改之后，红色遗产的制造者操纵了来自过去的文本、文物和视觉图像，以符合当代的政治议程，并将历史塑造成神话。

¹ Sebastian Heilmann 与 Elizabeth Perry 主编：《毛的无形之手：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11。

² 引用自 Lee 与 Yang 主编，《重新构想中国革命》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第11页。

正如何若书 (Denise Y. Ho) 在第 1 篇中所展示的, 保存和纪念中国 1949 年之前的革命历史遗址的任务,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 就是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是从民国和苏联的先例中汲取的灵感。其中一个关键地点是第一次党代会的场所, 这是党之创建的叙事起点, 是一个能够被识别并且被恢复、作为一个革命的遗迹和朝圣的象征性场所。本文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对该遗址的搜索和认证, 以及随后的重建和展览的呈现。借鉴了上海市档案馆的文献, 期刊, 以及最近的官方历史和回忆录, 何若书追溯了第一次党代会的展览——包括所展示的内容和讲解员的口述脚本——从 1950 年代到现在的修订。她认为, 在真实性和阐释之间, 在按照原样重建遗址 (作为文物) 与修改历史 (作为讲述) 之间, 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 为了应对毛时代和后毛时代接连不断的政治变化。在 1960 年代早期, 博物馆官员创造了一张官方历史的权威“面具”, 这是一种“精心设计以遮盖不确定性、矛盾和令人不安的真相”的建构。文革期间, 博物馆从政治教科书变成了政治冲锋号, 促进了对毛的崇拜, 并且对最新的敌人提出批评。此文最后, 考察了第一次党代会的遗址如何被翻修, 在改革开放时期其展览如何被重新创造, 以及它如何——无论博物馆学的新趋势和展览的内容如何替换——依然是“红色旅游”的中心, 同时也是上海迅速变化的城市景观中的一座革命纪念碑。

鉴于第一次党代会的遗址已经被发掘、重建, 并且作为民国时期的一个革命象征被纪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也渴望创造全新的纪念物, 以代表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面向全世界和后世万代。在第 2 篇《无悔建高楼》一文中, 朱涛将大跃进期间的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视为一个新的建筑学的里程碑, 并且引发了毛时代全国范围内的建筑热潮。政客们、城市规划师们、建筑师们都在努力创造出适合中国和社会主义政权的风格。十大建筑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劳动力, 在 12 个月的时间内完成, 即从 1958 年到 1959 年, 以赶上政府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最后期限, 而同时,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通过与民国时期的先例和当今的、被朱涛称为“国家资本主义风格”的大型项目比较, 本文确定了中国的一项悠久的传统, 即表露国家权威的宏伟建筑优

先于公民结构，比如学校和住家。朱涛进一步认为，“建高楼”的传统，不管成本多么高，社会影响如何坏，依然对当今中国的建筑、城市和社会发展有着强大的影响。特别是在2000年代，中央和地方政府聘请了国际品牌建筑师主持宏伟的建筑项目，并且举办盛大的活动，以掩盖社会矛盾，增强民族自豪感。最后朱涛表示，这种“拥抱改变，不带遗憾”的能力来自于一个革命传统，即以惊人的速度填补空白，而丝毫不担心“将过去残酷地抹去。”

红色艺术

除了建筑纪念物和标志之外，宣传画这一媒介在毛时代的红色肖像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艾华（Harriet Evans）在第3篇中指出的那样，无论考虑印刷的数量还是占据的空间，宣传画是文化大革命被创造和被终结的最重要的视觉手段。虽然艺术家们别无选择，只能遵循来自中央和地方宣传部门规定的信息和审美标准，他们的口述历史揭示了那些违背了宣传画的明确主题的想法和愿望。同样地，读者们和观众们也可以“窃取”图像中的言外之意来推翻官方的解释，从而为图像赋予微妙差别、多义性和模糊性。艾华认为，这些“含混的说辞”——在结构、构成、有时甚至是宣传画的颜色中呈现——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它们是如何同时唤起当代观众对恐怖和欢乐的、复杂又矛盾的记忆。在文革之后，那些曾经无所不在的宣传画在1980年代逐渐从日常生活的空间中消失，从1990年代起，又开始作为流行的收藏品回归。这些影像在流行的商业广告中、红色旅游和当代艺术中被广泛的再呈现，意味着一种复杂的主体性，同时公然对抗对毛时代的谴责和怀旧。

许多当代中国艺术家们都利用了文革宣传画的醒目意象，但王广义的作品尤其使人刮目相看。在第4篇中，唐小兵专注于王广义在2000年左右首次提出的“社会主义视觉体验”

的概念，以重建他的艺术中的概念演变，观察了到目前为止，王广义作品的成熟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在第一个“视觉批判”阶段，王将文革风格的政治影像与全球消费主义的流行标志并列。在第二个“文化批判”阶段，王将社会主义遗产转变为知识资源与文化认

同，并且表达了对当代各种现象的批判和反对。因此，他对社会主义视觉经验的“恢复”或者“回归”的努力与其说等同于一种政治声明，不如说等同于一种对文化的重新发现。然而，更具有挑战性的，是王对当代艺术作为一种制度的批判。唐小兵认为，这种“制度批判”，是艺术家作品的合理延伸。王声称他的艺术只是基于其他国人的创造的成果，他的目标是让艺术与商业艺术品得以区分，因此，王广义对他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帮助实现合法化的当代艺术体系提出了挑战。唐小兵认为，王广义的艺术发展的最新阶段让人想起了早期前卫运动的一些反体制的、反建制的政策，比如1960年代中期的红卫兵艺术运动。

红色经典

在1963年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警告要在全中国范围内防止“反革命复辟”，从而“改变整个中国的颜色”。[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1963年5月9日），引用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北京：外语出版社，1964，第71-72页。]通过被称为“永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中国可能走向资本主义的恐惧全面蔓延，这为文化大革命铺平了道路。然而，在毛泽东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改变了中国的革命道路，并且制定了一条“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本书的这一部分共包括三篇，通过比较跨越了毛时代和后毛时代的文本，提供了红色遗产在戏剧、文学和电影作品中的系谱学。作者们将这种文革后的文化生产视为新的、挑战并且批评了标准红色经典权威叙事的史学文献阅读。这些继承、延续、并挑战红色经典的新作品声称它们所呈现的历史和表现的形式都比红色经典更为真实。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一个十年中，文化大革命被正式否定，之前被“打倒”的人物得到平反，革命史学出现了更为人性化的版本。随着党放弃了对所有文化领域的全方位垄断，作者和电影制片人在颠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体裁惯例的同时，对革命叙事也进行了持续的反思和批判。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1990年代市场改革的深入，革命过去的创伤记忆也让位于对当

代中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腐败和社会不安全感的不满。在援引红色遗产的时候，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目的论，而且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目的论也受到了质疑，而这成为了对现状批评的资源。¹然而，市场本身迅速吸收了因为对经济改革失望而产生的红色怀旧情绪，出现了来自各种红色文化产物的商品。²政府同样利用复杂的红色遗产来实现民族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新意识形态目的，即使此时的“红色”已经被清除了其原本的革命性内涵。

在第5篇《表演“红色经典”》之中，陈小眉考察了从1964年到2009年间中国制作的三部革命音乐舞蹈史诗。1964年的《东方红》极大地推动了毛崇拜，该表演展示了音乐、舞蹈、戏剧、诗朗诵方面的顶级才华，同时歪曲了真实的历史，摒弃了其他革命领导人的角色，并且没有提到1949年之后的情况。在后毛时代，来自《东方红》的标志性歌曲继续出现在庆祝党、军队和国家诞生的年度音乐会上，以及退休人员和普通公民的业余表演中。以《东方红》为榜样，它的“姊妹篇”，1984年首演的《中国革命之歌》，修改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叙事，恢复了之前被抹去的革命领袖的角色，并且从个人的角度重新塑造了革命传说，主要呈现了母亲和孩子的悲惨牺牲，而不是英勇的男性烈士。《中国革命之歌》跳过了1949年之前的毛时代，演绎了从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作为一个胜利的新开端——的革命历史。最后，2009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而排演的《复兴之路》，通过强调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权和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拯救中国，避免国家遭受灾难并且走向繁荣，完全偏离了它之前的两个文本。陈小眉认为，在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新意识形态服务时，政治的审美化依然存在，再次证明了“革命史诗表演的持久力量”，以操纵“历史叙事，政治取向，明星与大众文化，以及民族主义情感。”

尽管在后毛时代，国家仍然继续控制着文化生产，然而新一代的作家依然可以众声喧哗。正如王德威在第6篇《小说中的红色遗产》中所论述的那样，在新的千禧年，大量的

¹ 参见，例如，Qin Shao, 《挥舞红旗：中国住房纠纷中的文化回忆与草根抵抗》（*Waving the Red Flag: Cultural Memory and Grass-roots Protest in Housing Disputes in China*），载《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2，第1期（2010春），第197-232页。

² Jennifer Hubbert 关于两个展出毛泽东像章的博物馆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在商品化的文物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参见《（重新）收集毛：当代中国的记忆与恋物》（*(Re)collecting Mao: Memory and Fetish in Contemporary China*），载《美国民族学家》（*American Ethnologist*）33，第2期，2005，第145-161页。

文学作品在批判现状方面更加大胆，并且在呈现历史阴谋和政治纲领方面，比围绕着“中国崛起”的热门话语更具有争议性。首先，王德威构思了一个革命文学的现代系谱，该系谱显示了小说为政治服务，启蒙青年，并且“为被侮辱和被伤害的人说话”的红色遗产，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和延安时期，彼时毛泽东呼吁所有的文学艺术都应该为革命政治服务。王德威进一步将毛时代的文学小说分成两大类：共和国创建前期的革命浪漫史与农民小说。这两种小说都试图引入革命和历史的辩证法，塑造进步的主体性，并且设想出一种乌托邦的愿景。在文革后的新时代，历史崩溃，革命失去了目的，1980年代的寻根作家与前卫作家改写了革命叙事，“从崇高到讽刺，从意义过剩到意义的空洞化。”在世纪之交，经验丰富的作家们，比如莫言和余华，以及更新的声音，比如阎连科和胡发云，通过梳理历史记录和政治宣传中的虚构痕迹，以及展示了过去六十年来共和国的生活经验的广谱性，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经典。

在对小说中的红色遗产进行讨论之后，马杰声（Jason McGrath）在第7篇《中国电影中的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讨论了毛泽东时代电影与后毛泽东时代电影之间的、形式上的与主题上的关联。与同期的文学作品一样，毛时代的电影结合了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描绘了社会主义英雄如何“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同时又是“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公民”。为了表明“共产主义的生活更有趣”，马杰声指出毛时代的多种电影类型——包括战争史诗、间谍惊悚片、音乐剧和喜剧——除了展现共产党如何解放中国，就是呼吁“继续警惕反动势力。”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电影失去了“历史的确定性”，在刻意引用毛时代电影类型的惯例的同时，却消除了红色电影的英雄主义，颠覆它们的进步叙事，从而揭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老套习俗，同时含蓄地声称一种自己的现实主义。马杰声使用“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术语，一方面来定义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的新电影，一方面强调它们对后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状况的现实主义描绘。这种新的现实主义利用了诸如现场拍摄、自然采光和采声，自然主义表现，长镜头和机位前移等技术，并且关注那些看似无关紧要或者偶然的细节。马杰声通过对中国电影所谓的第四代、第五代、

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作品进行仔细的比较阅读，探讨了毛泽东时代电影的代际互动，最后讨论了数字电影如何使这些趋势复杂化并得到扩展。

红色身体

在考察了在中国的遗迹、视觉艺术、戏剧、文学和电影中发现的红色遗产之后，本书的第四部分探讨了红色遗产如何以领袖和群众的身体作为媒介——无论是在物质意义上，还是作为一种呈现。这一部分的三篇讨论了毛泽东特型演员、张艺谋电影中的“人海战术”、以及阎连科小说中的列宁遗体，说明人的身体不仅是表现的主题和对象，同时也是革命得以进行和传播的重要媒介。¹在1960年代，对毛泽东崇拜的高潮时期，伟大舵手与数百万年轻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的“现场接触”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样的，在毛泽东时代每一年的周年纪念和政治运动之中，许多群众集会和游行都很重要。²通过摄影、绘画和建筑，毛泽东无处不在的面孔和身体，被无止境地再生产，在公共与私人的空间被展出，保留了激发了群众崇拜的神圣光环。

在逝世三十五年之后，毛的身体和形象依然继续主宰着政治权力的中心。在第8篇中，李海燕研究了毛泽东的“两个身体”的政治—神学思想如何在当代中国的毛泽东特型演员的表演艺术中继续存在。她认为，文革后，党最伟大的意识形态成就就是将毛泽东分裂成了凡人的“自然身体”和不朽的“政治身体”——一个会犯错误的、作为人的毛泽东和作为政权合法性之锚的毛泽东——因为他同时体现了人民主权论和一党专制。尽管李海燕称之为“公开的民族主义和暗中的资本主义改造”，但是党重新塑造了毛泽东的不朽身体“以支持发展目标而不是阶级斗争”。李海燕继续考察了在“主旋律”电影和电视中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以及在旅游景点和娱乐场所，新兴的自由模仿者模仿毛泽东的演讲和书法的现象。对这一讨论的构思来自对美国华裔作家李翊云的短篇小说《不朽》的深度阅

¹ 这种见解受到 William Schaefer 对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民是“一穷二白”的说的解读的启发。参见 Schaefer, 《一穷二白：历史的标记与流离失所的照片》(Poor and Blank: History's Marks and the Photographies of Displacement), 载《代表处》(Representations) 109, 第1期, (2010冬), 第5页。

² Hung, 《游行》(Parades), 载《毛泽东的新世界》, 第92-108页。

读，小说讲述了一个长着跟毛泽东一样面孔的男人的命运，最终他成为了毛泽东的官方特型演员。通过将毛泽东的模仿放置在从精神灵媒到讽刺艺术的表演实践的光谱之上，李海燕旨在厘清在毛泽东形象的光环与其美学和商业挪用之间的紧张关系。本文还讨论了西方记者们经常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毛的模仿者们一点都不滑稽？

不仅仅是毛泽东的身体被重新部署用于当代的政治和商业目的，人民—群众—的身体也随时被当代民族主义景观所询唤。在第9篇“人海战术”之中，若岸舟（Andy Rodekoehr）探讨了张艺谋作为导演和摄影师在三十多年来的电影作品中所使用的群众形象，他认为，这是中国革命视觉文化的遗产。通过考察张艺谋在仪式和技术可视性方面对人群的运用，这一篇展示了他导演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是如何使用“人海战术”和大规模可复制的宣传形式。作为一种从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遗留下来的遗产，“人海战术”描述了来自战斗部队前线的大规模猛烈攻击，主要依靠压倒性的规模而不是战略操纵。当个人的利益必须为了集体利益所牺牲的时候，中国继续部署了和平时期的战略，以创造一种“紧急状态”（或者忘形状态）——正如在大跃进时期和北京十大建筑的建造时期的情况，即朱涛在第2篇中所写的那样。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群众的身体被以类似的方式集体动员了起来，尽管在开幕式上，所有与毛时代相关的明确信息都被仔细地删除了。张艺谋的历史古装片，比如《英雄》（2000），《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都是对这种人海战术的共谋和批判，人群的繁复形象从属于主要角色之间的更合理的戏剧冲突，从而质疑了领导者和群众之间存在的、有问题的关系，并且揭露了政治美学场面如何掩盖了有助于其形成的暴力和牺牲。最后，若岸舟分析了张艺谋从1980年代起、在早期第五代电影中对人群的电影拍摄——作为一种面向他们曾经承诺过的乌托邦的“空洞姿态”，指出了张艺谋银幕上的群众催生了消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群体，而不是革命群众。

在第10篇《时代错乱：阎连科小说〈受活〉对社会主义的纪念与商品化》一文中，罗鹏（Carlos Rojas）通过看似消失于历史裂缝之中的、下属主体的棱镜，阅读当代中国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在阎连科这篇2004年发表的小说中，湖南省的一位地方官员

伪造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他从俄罗斯购买了被保存的列宁的遗体，然后将它安置在一座新建的陵墓之中，以吸引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这项举措为该县带来了花不完的钱。罗鹏指出，这部小说通过设置了在赤裸的生命与生不如死的状态之间的辩证法，特别是两种状态与商品的关系，探讨了当代中国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内在的一系列结构性张力。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为了揭示资本和利益驱动型发展的恶性运作方式，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反常的资本主义驱动力，这种驱动力来自一个被保存下来的、马克思主义遗产的象征。罗鹏认为，列宁的尸体所体现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法，象征了冷战共产主义政权的死亡，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持续力量和它所激发的修正性批判。

红色阴影

本书的前四部分重点介绍了红色遗产对于当前的象征性资本以及对现状的讽刺性批判的文化挪用。第五部分则强调了被拒绝的、被编辑的、或者以其他方式遭受国家选择性遗忘的深红色遗产。尽管共产主义付出的代价与失败依然位于“能说”和“不能说”之间，尽管毛时代依然发挥着影响力，并且成为了当代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与制度领域上的一片阴影。第11篇和第12篇讨论了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即红色遗产既是鼓舞人心的理想，也是悲惨的现实——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如此。同时，最后两篇论文也呼吁复兴某些红色遗产，比如反对霸权的游击精神，以及旨在为底层记忆发声的毛主义的文化实践。

巴金在1986年时呼吁建立一个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尽管余音尚在，但正如第11篇“毛时代的纪念场所”中所展示的那样，大跃进饥荒和文革的创伤记忆几乎已经从官方公众文化中消除。不过，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私人的、边缘的、碎片式的倡议来建构外围的、小规模收藏毛时代文物的博物馆以及其他纪念场所。除了四川建川博物馆和汕头文革博物馆之类的著名机构之外，这篇文章还讨论了荒废的墓地和乱葬坑，劳改营和五七干校遗址，以及当代艺术画廊。其中一些场所是毛时代建造的，例如60年代举国闻名的刘文彩“地主庄园”与“收租院”雕塑系列，以及在文革派系武斗期间，红卫兵为死去的“烈士”所

建造的宏伟的墓群。在展示了这些遗址的含义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之后，这篇文章还对纪念馆和博物馆提出了一系列策展建议，以期将毛泽东时代的记忆传承给后代。从全世界各地的、纪念极权主义历史、人为灾难的受害者和失败的乌托邦计划的机构和纪念馆中汲取灵感，此文主张采取多元化的、地方性的纪念措施，将创伤与怀旧、主观记忆和客观文献、宏大历史事件和日常生活用品、学者和艺术家、共同的认同和批判性反思结合在一起。它强调了四个相关的范式：“绊脚石”，或者为特定的受害者在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树立一个小纪念碑；以口述历史收藏为特征的文献中心；被保存和改造的大型遗迹；以及邀请当地居民捐款的社区博物馆。

在本书的最后一篇论文中，白杰明（Geremie Barmé）查考了一些“毛泽东时代和国家社会主义持久的、迷人的遗产”的痕迹。以2012年3月薄熙来的“陡然跌落”为起点，白杰明表明，红色血统和家庭关系始终在红色象征资本转变成经济和政治资本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¹当思想家们为了拯救马克思主义而努力时，红色遗产构成了一种文化的、知识的和语言实践的主体，在中国的制度性行为中根深蒂固。与此同时，革命历史的虚构化在流行文化中迅速发展，白杰明写道，“正是在对这些高度的毛泽东主义政策、文化风格和形式的重塑、讽刺和叙述中，我们可以察觉那些无能为力的、无权无势的、一无所有的人如何发现了一种对党理论主导对话语、思想和日常政策的垄断的反对的方式。”虽然来自内部的抵抗可能是最犀利的红色遗产，“反叛的精神，积极参与煽动、行动和危险的政策，是一种似乎只有在足够远的距离上思考才安全的遗产。”最后，白杰明指出了历史记忆的必要性，并且要警惕“深红色眼罩”²，因为它删除或者阉割了过去的挫折和失败，

¹ David Apter 与 Tony Saich, 《毛泽东共和国的革命话语》（*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

² 译注：19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史学界经历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历史之战”，当时历史学家们通过研究揭露了殖民时期的丑陋历史以及澳大利亚土著曾经遭受到的残酷对待。彼时这些研究受到政府、右翼媒体的强烈抨击，并被嘲笑为“黑臂环”式的历史观（在很多文化中，包括东方和西方，佩戴黑色臂环都是怀念逝者的表现）。作为反击，这些历史学家以及媒体支持者们反击对方持有的是“白眼罩”式的历史观。而在中国，Barme 认为，这种眼罩是深红色的。

以制定连贯的叙述，为专制政权的文化合法性服务。

遗产：财富还是债务

本书的撰稿人都关注红色文化遗产的价值，但是我们并不相信任何简单化的、全面性的肯定或否定（因此，我们强调遗产的多样性，而不是单一的某种遗产）。我们关注与昔日革命相关的文化产物在当前背景下可能具有的各种内涵和含义——积极的或消极的，怀旧的或创伤的，严肃的或搞笑的。我们还研究了红色文化遗产与当前的政权合法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提出了革命历史如何能够成为国家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的问题。除了国家挪用之外，个人是否也能够将红色遗产的象征性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或者抵抗的策略？最后，我们要问的是，革命历史是否能够为更美好的未来提供另类的方案。革命接班人们能否在驱散过去的诅咒的同时，获得历史的祝福，或者在获得遗产之前，是否必须偿还债务？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革命历史、以及构成毛泽东时代的集体记忆的创伤与怀旧之外，我们还表明了，极权主义美学、语言、习惯和策略——以及对人类牺牲的忽视——继续以隐藏的、可能是更强大的方式施加影响。当下的政府并没有面对或厘清毛时代的灾难和理想，而是继续通过表演艺术、话语实践、公共建筑和动员策略中的红色遗产，来构建权力的宏伟外观。朱涛（第2篇），陈小眉（第5篇），以及若岸舟（第9篇）考察了国家赞助的、涉及大量人力资源的宏伟项目在规模、速度和成本方面的红色遗产。无论是大跃进期间还是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无论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还是六十周年，数字和速度的逻辑决定了人力的资源的“全面动员”中的一切。换句话说，红色极权主义美学在超越和吸收意识形态矛盾方面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多样性。

我们需要同时呼唤革命乌托邦的理想与记住到人类巨大的牺牲——以及看到“积极的”和“消极的”革命遗产是如何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在梳理出各种红色遗产之间的区别和色调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避免——正如白杰明所说——“‘战略性分解’意识形态/理论与历史事实/生活”。如此“战略性分解”可以高举抽象的理想而“清除过去血腥

且悲惨的现实”。红色遗产的持续吸引力、相关性和显著性存在于未曾实现的、社区和社会正义的空隙之间，这些未曾实现的正义激发了过去的革命者和伴随着革命经历的、无人哀悼的创伤。在充当这些愿望和记忆的渠道的同时，红色文化也可以用来支持和批判现状。

在新千年的主流文化中，文化生产者摒弃了有关红色遗产的单一叙事，而转向创作可以对过去和未来愿景有多种理解的作品。正如我在第 11 篇中所写的那样，即使没有官方许可，民间社会也开始创造记忆场所，在与毛时代相关的创伤与怀旧之间进行调解，从而为过去的代际传递开辟了视野。王德威认为，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小说”梳理了历史动态之下的复杂痕迹，因此，对于一个被“大话”淹没的社会，从理论到批评、教条和宣言，算是一种补救的措施（第 6 篇）。随着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让位于全球资本主义，值得考虑的是——同时也值得批判，正如朱涛所做的那样——国际建筑师提出的、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的建议，在这个至少在名义上依然是共产主义的国度（第 2 篇）。最终，中国的红色遗产的命运还远远未被终结。尽管它们依然被当权者利用或绑架，然而它们依然有可能被转化为子孙后代的共同遗产和教训。📖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ereafter HUAC), and Wu Di, editor of the journal Jiyi (Remembrance) "Introduction: Discerning Red Legacies in China," a chapter from the book Red Legacies in China, by Jie Li,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in 2016. Copyright 2016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Jiyi--Red Legacies Introduction contract)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与《记忆》编辑吴迪关于《中国的红色遗产》导言的协议：李洁撰写的《发现中国的红色遗产》一文，系李洁主编的《中国的红色遗产：共产主义革命的文化来世》一书的导言。此书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 2016 年首次出版。其版权为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所有，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允许《记忆》翻译、发表此文。

【红色文化译介】



作者简介：

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斯坦福大学汉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康乃尔大学。主要著作：《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此书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2009年度列文森奖，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中文版），《陌生人与中国的道德想象》（*The Stranger and the 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等。

李海燕的红色遗产研究

《毛泽东的两个身体：关于扮演伟大舵手的奇特艺术》

译介：度关山/原著：李海燕

在本文中，李海燕对毛泽东的“两个身体”的探讨，从留美女作家李翊云的短篇小说《不朽》开始。《不朽》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49年10月1日，一位木匠的妻子怀孕了，在怀孕过程中，她总是拿着毛主席肖像看，于是十月怀胎之后，她生下了一个长相与毛泽东十分相似的男婴。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长大了的男婴前往首都北京，成为了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他成家乡人民的骄傲。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社会转型，这位年轻人不再受到重用，并且被卷入了一起嫖娼的性丑闻中。他返回了故乡，在他母亲的墓前挥刀自宫，无意之间，成为了这个小镇历史上的又一位有名有幸的阉人——在历史上，这个小镇就以不断地向紫禁城输送阉人、并且出了一些大太监而出名。

《不朽》的故事展现了毛泽东时代的种种荒谬和疯狂，对于这一点，西方的读者非但不陌生，而且似乎总是很有兴趣。如同张戎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一样，《不朽》

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时代的生活只有疯狂，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被歪曲的、轻率的乌托邦视野。不过《不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没有落入“描述无辜的个体由于家庭背景或者个性问题被无辜迫害”的窠臼之中，而是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某种“吸引力”影响下的人生起伏，这种吸引力将他引入白热化的政治中心，直到他被那炽热“烧成灰烬”。在历史上，从小被去势且被送进宫的男孩，他们的家人保存着他们的“子孙根”，在他们死后能够与尸身一起下葬，而在这位年轻人失踪之后，他的乡亲们面对他的“子孙根”心情十分纠结，如作者所写的：“为了我们的心灵平和，我们每天都为他的健康祈祷。就像我们为伟大领袖祈祷一样。我们不希望他的故事结束，而且对我们来说，他的故事永远不会结束。”

李翊云《不朽》的故事终止于此，但特型演员的故事却远远没有结束。实际上，自从1970年代后期，国家在影视行业一直注重培养特型演员，最著名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蒋介石的特型演员。在2009年的电影《建国大业》中，两代特型演员与众多影视明星一起，呈现了一场华丽的“致敬”礼。毛泽东去世后的毛崇拜，部分受到政治派系的权宜之计驱动，部分则由商品化的大众怀旧驱动，给那些与伟大领袖长相相似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职业选择，一种对党的历史和传说的审美，以及一种模仿的技巧。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的特型演员的制度性实践，以及在娱乐和餐饮场所出现的、自由“模仿者”的新兴现象。作者将对毛泽东的模仿放置在表演实践的光谱之上，一端是精神通灵性，另一端是讽刺艺术，不但要弄清楚毛泽东的“形象魔法”及其美学与商业挪用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也要批判李翊云讲述的故事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正是西方对着对中国的理解（以及误解）的基础。

毛泽东的形象魔法

在李翊云的故事中，提到了一种民间信仰，即“孕妇在孕期经常看谁，生的孩子就像谁。”这种民俗信条可以作为毛泽东崇拜的原始宗教维度的注解。毛泽东形象的传播过程，

类似于某种宗教或者神奇的狂热崇拜。毛泽东的形象无处不在，丝毫不曾失去一丝作为中共领导人的、被压迫者的解放者的、团结中国的神圣象征的光环。毛形象拥有一种“形象魔法”，假定了肖像与其描绘对象之间的神奇同一性。种种政治仪式，比如批评与自我批评、批斗会、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都是在毛泽东的“目光”下进行的——通常是标准的天安门毛像。偶然或者故意破坏毛像的行为，通常都被认为是一种“大不敬”，在后毛时代的写作中，这个场景经常出现，用来突出，毛时代的狂热国度。

在李翊云的故事中，毛泽东通过“图像魔法”让木匠的妻子“受孕”。实际上，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木匠之子的诞生，让读者们想起了基督教中玛丽受孕的神话隐喻。尤其是，故事中的木匠早早去世，妻子在18岁上就守了寡。孩子出生之后，乡亲们就陷入某种不安之中，他们担心自己没有表现出对他的那张脸的足够尊重，从而被批判为反革命；他们又担心自己过度地尊重那张脸，从而崇拜了“错误”的偶像。后来，年轻人去了首都，开始享受他的脸给他带来的种种“福利”，他出现在毛泽东的宣传片与全国性的庆祝活动之中。通过完美的模仿，他成为了一种政治精神媒介，通过他，观众们重新找到了领袖“父亲”，国家再次成为一体，然而代价是，作为媒介的年轻人成为了牺牲品。他无法体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夫妻生活。在他年轻的时候，所有的姑娘都“配不上”伟大领袖的脸。而当他老去，他的那张脸却已经不吃香了。后来他打算去找妓女，却被妓女和皮条客“仙人跳”。他被官方认为“玷污了伟大领袖的形象”，然后遣返回乡。随着他在母亲坟前自宫，故事形成了一个闭环——在历史上，这个小镇有着太多被送进宫的阉人，他们中有一些人成为了大名鼎鼎的大太监，为家人和家乡带来财富和荣耀。但是，这位年轻人与昔日的大太监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为什么李翊云将故事设置在这样的小镇上，并且让乡亲们用谦卑的目光仰视他，在妄想中将他当作一种骄傲？

这位去势了的模仿者似乎表明，在清朝灭亡之后，东方专制主义的幽灵继续困扰着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开始热爱他们的暴君，这个故事似乎表明，他们应该受到暴政和压迫。当年轻人的职业生涯陷入困境，他的自残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迟来的企图，他想要

摆脱导致他如此悲痛的自我的最后残余。但是与年少进宫、获得权力的宦官不同，年轻人的身体已经被权力滥用了。他的自残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抗议。因此，他代表着中国人民可能不会无情地受到奴隶制的折磨，或者注定要生活在帝国暴政的阴影之下，无论毛泽东本人是类似或者有意识地成为一位帝王。

无论是在精英阶层，还是大众阶层，毛泽东是中国的新皇帝的想法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虽然历史学家们并不以为然。但是显然这种想法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很容易被拿来作为意识形态游戏中的修辞武器。Geremie Barmé注意到了这种帝国隐喻的滥用，这些隐喻充斥着“东方倾向的形象”，将毛至于“某种奇怪的、难以理解的东方行动中，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某个人的命令和帝国的层面。”虽然共产党的确具备儒家传统政治的元素，特别是政治的道德化，但是毛泽东绝对不是现代的“帝王”。Barmé警告说，毛泽东本人、崇拜者和批评者都很喜欢使用帝国隐喻，这会让我们看不清王朝统治和现代政治理性之间的鸿沟。

首先，作为统治者的毛泽东治下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现代行政机器，这是中国皇帝无法想象、不能实现的。其次，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救世主”的观念并不是“伪装的君主主义”，而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的简写，这种意识形态主张党、国家和人民的身份是历史的集体代理人与新政治秩序的主权主体。毛泽东不是“天子”，在上天与人民之间调节治理，而是代表人民融入政体。他是人民的代表，对毛泽东的崇拜，实际上是涂尔干所说的“共同自我崇拜”。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国王被认为拥有“两个身体”，自然的身体和政治的身体，自然的身体会死亡，政治的身体则不会，作为人民的统治者，只要人民存在，国王永远不会死亡。毛泽东或许也拥有这样“两个身体”。据说毛泽东的身体有“脚踏实地”的味道，他不讲究个人卫生，对年轻女性的陪伴很渴望，并且脾气暴躁。毛泽东的政治体制是政治合法性的同义词，对于党的统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官方所云，“毛泽东思想”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不得不以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行事。否认毛泽东就等于否定政权的合法性和政治秩序的基本前提：党代表人民的团结，代表人民执

行无产阶级专政。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只是人民主权和一党专制统治的拟人化。

毛泽东的两个身体证明了，从皇家到人民主权的过度中，国王的两个身体并不是简单地消失了，而是在人群中横向分散。在没有超然的合法性来源的情况下，“内在的过剩”可以被浓缩，并且转移到一个新的、主流主权原则的肉体承担者：具有超凡魅力的民粹主义英雄。

毛泽东的“分裂”是共产党最大的意识形态成就。一方面，党将毛泽东身体比较粗俗的一方面从大众的视野中屏蔽；另一方面，一个快乐的身体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挥舞着锄头的、穿着浴袍的、微笑看着孩子们的、与工人握手的。正是这个不朽的身体形成了毛泽东神圣图像的躯体基础。

在当今，毛泽东的“两个身体”的政治神学在后毛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的“清算”中，有两个奇特之处。其一，毛泽东的遗体并未下葬或者火化，而是被防腐处理后被安置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的纪念馆之中，作为一个朝圣的对象，象征着毛的不朽与党的统治的永久性。其次，毛泽东的生平通常被认为是“三七开”，这一点被投射在他的“两个身体”之上，毛的失败局限于他作为人类的身体，而作为政治合法性的锚点，毛泽东从未受到批判。

在改革开放时期，党开始了表面上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改造，毛泽东的不朽身体被重新定位，以支持发展的目标而不是阶级斗争。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出现了。这似乎是一个自然的步骤，但是毛泽东的戏剧化实际上是毛泽东去政治化或者“去毛化”的开始。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中，毛没有任何戏剧化的呈现，他作为一个被崇拜而不是被批判的独特人物，参与各种高度精心策划的政治仪式中，这并非是偶然。在后毛时代，毛泽东的戏剧化试图重新获得神秘性，但也为世俗化的后果打开了大门。

斯大林生前，苏联曾经拍摄过与其相关的电影。但是在电影中，斯大林的形象总是一个孤独的沉思者，是为了所有意图和目的的“木乃伊化”。斯大林的电影形象十分僵化，与纪录片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毛泽东生前也有类似的影片，那么他的形象也会一样僵化。实际上，在后毛时代早期，对毛的影视表现，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这种纪录片式的限制。

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1939-2005）在1978年被叶剑英元帅选为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他出演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广受好评。他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特型演员一样，在一生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扮演过其他角色。他们的生活十分低调，几乎没有机会利用他们的公共形象谋取私利。古月等人收入低微，但党明令禁止古月从事任何商业活动。古月的去世也是默默无闻的。

自从1990年以来，新一代的特型演员登上银幕。尤其是唐国强在2009年的“主旋律大片”《建国大业》中成功饰演了毛泽东。唐国强的职业生涯并不是仅仅作为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他曾经是奶油小生，一代人的偶像。有批评者质疑唐国强的职业生涯过于复杂，并且与毛泽东并不太“像”。但是他在《建国大业》中的扮演是成功的。新一代的特型演员往往本身就是“明星”，他们不再是提线木偶，尽职尽责地按照陈腐的历史剧本演出。

古月一代的特型演员经过了严格的训练，包括口音、说话方式、手势等，同时尽可能地隐藏他们自己的个性。唐国强一代的演员在创作上则更加自由。并且他们也可以在影视作品展现出领导人们比较“日常”的一面。比如在《建国大业》中，毛泽东喝得双颊泛红，靠在柱子上看着周恩来和朱德唱国际歌。他们展现了领导人们的好恶、活动和个人怪癖。换句话说，他们的模仿更接近市场及其名人文化，并且进一步远离政治仪式的戏剧化。

毛泽东的政治身体依然存在，但是赋予其神秘力量的框架已经截然不同了。在今天，毛泽东的角色跨越了政治仪式和大众娱乐之间越来越模糊的界限。党努力减缓毛泽东形象的世俗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但是收效甚微。毛泽东的角色越来越脱离创造和维系它的体系，并且越来越依附于作为天才政治家的毛泽东，及其公众形象的创作者。

近年来，“山寨的”毛泽东大量出现，尤其是在旅游景点和娱乐场所。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法律意识的舆论制造者提出了毛泽东的“宣传权”问题。在西方社会，名人的形象受到了宣传法的保护。在中国，问题不是毛泽东是否拥有自己的形象，或者他是否应该受到宣传法的保护，而是党面对市场经济是否能够保持对毛泽东形象的垄断。

2005年，《新京报》报道了一个“山寨毛泽东”的故事，一位在京郊度假村扮演毛泽

东的孙先生。他在度假村表演毛泽东演讲、写毛泽东书法，并且提供每张20元的拍照服务。文章引用了政府官员和法律专家的意见，指出孙先生的做法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

2009年，张秉坚拍摄了一部关于两位毛泽东的模仿者的纪录片《现成品》。一位是来自湖南张家界农村的彭天；一位是来自四川绵阳的陈燕。一年花两万五千块钱学费在此进修的湖南农民彭天整天穿着毛泽东的服装穿梭于帅哥美女当中，吃饭、走路、上课都不脱下他那一身行头。电影学院的学生喜好拿着机器在校园里拍来拍去，但没有人对这位“毛泽东”感兴趣。彭天是家乡人的骄傲，他拿着家人贷款的钱去北京学习，并且每次回家乡都能引发种种围绕着毛时代的主题狂欢。

陈燕的入选是因为她是中国惟一的毛泽东女性模仿者，她甚至因为模仿毛泽东而与家人闹翻。她的丈夫因为不想“和主席上床”而拒绝与她同房。实际上，他认为，陈燕是一个女人，不应该“玷污”毛主席。陈燕表明，她之所以还在继续扮演毛泽东是因为“老百姓”的认可和需求。当她出现在街上的时候，路人们争相与她合影，但似乎只是因为她的性别。无论是彭天还是陈燕，他们的坚持似乎都出于对公众的认可怀有一种使命感。

总的来说，山寨毛的增长似乎表明了国家态度的松懈，只要他们的表演不会“越界”或者堕落为漫画、滑稽戏。到目前为止，党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阻止了对毛的讽刺。尽管如此，自由职业者还是大胆地远离毛泽东模仿的制度化实践。他们甚至比第二代特型演员更自信。他们像是追求将精神融入他们自己的角色的巫师。他们通常主动抵制滑稽表演，并且强调其艺术高尚道德目的。然而，观众如何欣赏和解释他们的表演并不总是由党或者甚至他们自己决定。讽刺很有可能是存在于旁观者的眼中。

毛主席不可用来搞笑

对于外国人来说，毛泽东特型演员和他们的观众们之间所遵守的行为准则有些莫名其妙。因为在西方的政治讽刺传统来看，模仿政治家的目的就在于嘲笑和讽刺。在西方人看

来，对毛泽东的模仿类似于模仿“猫王”——都是向伟大的人物致以“复杂的敬意”。但是似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模仿并没有像西方人对猫王的模仿那样，享受到刻奇的乐趣。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中国人了解到了“搞笑”的传统。1990年代末期，互联网还没有经历审查，当时就有网站以洋葱新闻的方式嘲笑新华社。2000年之后，“净网”行动开始，大多数的“危险对象”被排斥在墙外，政治幽默变成了一种名为“恶搞”的互联网幽默。

“恶搞”起源于2006年，一位名叫胡戈的电子音乐人对陈凯歌《无极》的恶搞。后来，胡戈又恶搞了CCTV的新闻。胡戈和他的同行们，迄今为止还没有遭遇诉讼，也没有受到官方制裁的威胁。这足以证明中国人对刻奇的乐趣并不完全无动于衷。相比之下，恶搞毛泽东的现象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原因，最重要的是中国政治的神学本质。陈凯歌与CCTV都是公平的游戏。陈凯歌不是政治人物，CCTV则自认为是专注于职业新闻的现代通讯机构。人们可以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审美上的批判和嘲笑。

西方社会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国王的两个身体的神秘思想，在政治家和他/她的职位之间插入了一个制度性的楔子。因此，理论上讽刺政治家不会破坏政体的神圣性或宪法原则。在现代，西方的政治模仿受到言论自由原则的宪法保护，并且经常被学者们视为“弱者的武器”。在政教分离的国度，模仿明显已经脱离了仪式的领域，从而失去了其神奇的、煽动性的力量。一般而言，模仿已经成为一种与政治生活不连续的艺术形式，而不是对神奇的再生的呈现。

因此，艺术是魔术的升华，对仪式功效的关注被对审美价值的关注所取代。西方人将他们的审美品位带入到对中国的想象之中，创造了大量对毛的“大不敬”作品。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产业和其它文化产业没什么区别。对于后毛时代的中国研究或者新闻著作来说，毛泽东的形象或者名称已经成为一种噱头或者修辞手段。

结 论

本文主要研究毛泽东两个身体的政治-神学思想如何在当代中国毛泽东模仿的表演艺术中体现，我们讨论了特型演员的制度化实践，包括主旋律影视作品、新型的“租赁毛泽东”现象等。我们的讨论从李翊云的短篇小说《不朽》开始。尽管毛泽东的模仿始终处于表演实践范围中的精神通灵的一端（另一端是讽刺），它依然是一种流动的、不稳定的实践，无论审查制度还是宣传法都无法永久地控制它。这种做法产生了矛盾的效果，既延长了毛泽东政体的生命周期，又缓慢地将其杀死。实际上，正是党本身开创了将毛泽东从“宇宙救世主”和历史的“主体和主人”转变为集体怀旧对象的过程。尽管如此，去毛化的车轮，将毛泽东从神变成名人，缓慢但是稳定地脱离了党的控制。

对于中国互联网一代，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对毛泽东模仿的讽刺，这是无数历史价值所共有的命运。余华曾经讲了一个互联网的笑话：假设毛泽东死而复生，从水晶棺中走出，他走到阳光照耀的天安门广场，一时熟悉又陌生。一群游客发现了他，然后冲过去，喊道：“古月，请给我签个名好吗？”在活着的时候，古月不允许培养任何个人名望，然而，死后，这位特型演员却“出名”了，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的形象魔法被那些正在进行模仿毛泽东的艺术的人所“玷污”，无论是否有官方的支持。

回到开篇的小说中，我们可以认为，李翊云故事中的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沉溺于如此深刻的绝望之中。他完全可以再就业，在婚礼上、生日派对和电视节目中巡回演出，以自己的方式寻找自我实现和获得满足感。而如果有一天，毛泽东终于成为了市场逻辑的牺牲品，被更加流行的流行偶像挤到了边缘，这位年轻的毛泽东模仿者也为杀死毛泽东的政治身体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不需要挥刀自宫，以自己的男性气概作为代价。作者对李翊云的批评落在了最后一句话上：有时候，小说必须跟得上时代（译注：即使西方读者想看到荒诞的毛泽东时代的疯狂寓言）。

【红色文化解读】

联合体里的“自由”是集体主义能力

——重读《共产党宣言》

王克明

对于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灾难的发生，影响最早且最大的是《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这份共产主义纲领性文件中提及“自由”这个词时，主要用于对市场经济的否定，如：“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就会消失……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在批判普鲁东主义的时候，《宣言》把自由贸易、保护关税与单身牢房归为同类。¹《宣言》反对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并发誓消灭它们的绝对态度，一目了然。

引人注意的是，《宣言》在述及共产主义时，有一段话也谈及“自由”，但不是对自由的批判：“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自由是基本人权，是人类文明普世价值，是共产主义集体价值观根本排斥和反对的观念，为什么《宣言》里也说“每个人的自由”？

此自由非彼自由。首先，这是限制在“联合体”里的“自由”，被限定了范围。对“这样一个联合体”，《宣言》的描述是“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²，这是相对于资本家“纯粹个人的地位”³而言的，即“联合起来的个人”不是“纯粹个人”。如此，“联合体”里的“每个人”，只能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实际上是所有“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自由发展。

¹ 《共产党宣言》：“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

² 《共产党宣言》：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

³ 《共产党宣言》：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地位。

《宣言》这段话中，“每个人”和“一切人”是个体与群体的差别。这二者的关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条件，“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目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需满足“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即个体需满足群体的需要。那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必然是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一联合体目标的手段和工具。

波普尔批评《宣言》里的这段话：“这真是一种美妙的信仰。然而是一种美学的和乌托邦的信仰。”¹他的批评尚不到位，因为这不只是意象世界，而是可以人为强制造成；也不只是乌托邦空想，而是具有实践性的共产主义蓝图。区别在于，《宣言》这段话表述的是与波普尔不同的自由观，是与人类普世价值不同的自由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是对必然——称作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自觉地依照对必然的认识，来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从而具有整体性根本性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以实现设定的共产主义目标。这被定义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依照对必然的认识来支配自己，是个人按不可抗拒的规律的需要来改造主观世界。这时，个人要实现的并不是自己决定的目标，而是外在决定的目标，那个改造客观世界的特定目标。

这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描述的应该是联合体里的每个人都达到自由王国境界，具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自觉，改造成为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和理想的新人。可以参考卢梭的自由观来理解这种“自由”：“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²每个人通过强制改造，被迫有了这种与“公意”保持一致的“自由”，联合体就具备了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整个联合体达到自由王国境界，有能力按照所谓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推导出来的蓝图，去实现设想中的社会福祉最大化。这是《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的意义所在。这里的自由不是“每个人”能自己决定的自由，而是“一切人”共同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

这不是自由。阿克顿勋爵说：“自由不是为了达到更高的政治目的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³但《宣言》的“自由”，是以改造世界和改造人为目的，是对这种外在决定的服从。把这样的“自由”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是康德之谓“假然律令”的工具理性产物。按康德的自由理论，纯粹理性无条件地尊重人，不牵涉不依附于任何其他目

¹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225页。

²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24页。

³ 约翰·阿克顿《自由史论》，译林出版社2001年，20页。

的，也不需要关注行动的目的和结果，只看是否对每一个人足够尊重，目的只是“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但《宣言》的“自由”，目的不在于“人”，而在于排斥“纯粹个人”的“一切人”，即社会——联合体，“每个人”只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因此这是他律的工具理性目的。工具理性给人提供的是追求功利目的的手段。《宣言》的自由观，可谓一种工具自由观，适用于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手段。

根据康德，只有在意志是自主决定，受制于自订定律的时候，人才是自由的。受制于所谓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受制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改造社会目标，人便成为追求目标的工具，不自由了。自由的人，有能力在行动时不遵循外在强制的定律，不把改造客观世界看成目的，不以个人自由为手段去实现外在的群体“自由”目标。个人自由本身就是人的终极目标，而群体“自由”是马克思主义自由王国的目标。康德的自由观永远把人当目的，无条件地尊重人的尊严，使人人追求自我目标。从这样的自由原则出发，人类社会建立起了人权普世价值。而从《宣言》的“自由”推导出来的是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建立起来的是集体主义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价值。

功利主义倾向于把人当作促进整体福祉的手段，共产主义表现出了最激进的功利主义性质，是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工具理性产物。它为满足人的物质平等欲望，提出了排斥法治的——即非法的以暴力手段强制实现的功利最大化解决方案。它提出，针对穷人与富人的物质不平等，需要通过非个人的、群体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用暴力手段夺得整体性的物质利益。亚里士多德早已认为，为统治者、富人、穷人的任何一方谋求利益，而不是为全体公民谋利的政体，都不是正确的政体。¹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对任何人的尊严的尊重，富人是被暴力剥夺的对象，穷人则被规定到了改造世界的“他律”之中，成为“迫使他自由”的对象，成了促进未来整体福祉的手段和实现解决方案的工具。

以什么样的名义，才能“迫使他自由”？只能以高于民众当下利益和自身价值的名义，那就是“根本利益”。柬埔寨共产党为迅速实现共产主义幸福，驱赶全体市民苦难下乡，并屠杀人口，目标就是那种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其逻辑是，每个人的幸福终点都在根本利益那里，为了实现根本利益，必须损害个人当下利益，以便整体改造世界，只有整体改造世界才能实现根本利益。根本利益是一种对平等远景的理论描述，是整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是整体未来利益而非个人当下利益。而实践中，根本利益是统治集团的利益。

¹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9b5-10, 1289a25。

个人当下利益建立在演化形成的个人自由权利和私有产权之上，是文明演化中个体需求的随机性反映，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正是演化的性质。根本利益却建立在对未来整体幸福的确定性叙述之上，以人为指定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为理论支持，其实现前提是消灭私有制和个人自由。

把财产权利和生命尊严建立在个人自由理念之上，尊重人的自由权等，人类可以有多样性的幸福观。而把所有个人权利置于社会功利目的之下，社会只能存在某一种幸福观，排斥其他。在一种幸福观上建立政体，如在根本改造社会是最大幸福的观念之上建立推行社会改造的强权，就会把根本利益价值观强加在所有人头上。这样的政体绝不尊重人人追求自我目标的权利。因此，《宣言》中的“自由”，是马克思主义自由王国的“自由”，是共产主义蓝图中的“自由”。波普尔深刻地指出过，把自由包含在蓝图之中，自由便无法实现。¹

马克思主义的蓝图即《宣言》讲的联合体，也说共同体。《德意志意识形态》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这种共同体的性质，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²。相对于“单个人的所有制”——亦即“纯粹个人”的私有制，个人所有制的定义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³。或许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个人所有制”。这应该是马克思设想的可以实践的所有制，因为“重新建立”一定是建立人类以前实践过的制度。

《反杜林论》说“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共产主义原理》说“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依据这样的论述来认识共产主义个人所有制，那么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记述的一种“土地为公共所有，而且共同耕作，而产品则分配给个人以供他们各自享用”⁴的古希腊外邦人的财产共有制度，和与古希腊这种制度相同的上世纪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集体所有制，正符合“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

¹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06页脚注：“假如我们试图按照某个蓝图来构造社会，那么我们会发现我们不能把个人自由包含在我们的蓝图之中，或者如果我们这么做，我们就无法实现它。”

² 马克思《资本论》。

³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⁴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3a。

这种制度与个人自由无关，而是一种古代制度，一种农业社会早期出现过的食物平等制度。人类思想从来是以过往为参照，无法以未来为参照，马克思从对古代农业分配秩序的参照中得到启发，为工业社会设定了未来的平等终点。但那之后，出现了以这种未来设想为参照的思想标准和制度标准，命名为先进思想和先进制度。这样的思想方法适用于人的不自由改造，其制度实践不过是“重新建立”只能用于农耕社会的物质平等制度。从这种“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共同体的设计中观察到的，是相对于人类社会演化进程的反动。

同时，个人自由并不等同于发展才能的手段，不等同于同时在几个部门发展、今天明天上午下午做不同的事情。这种简单空想表现出马克思对群体“自由”中个人自由理解的局限，反映出他始终着眼于整体的“自由王国”，而缺少对个人自由的关怀。个人自由是不被他人强制的自主状态，是被马克思否定的包括财产权在内的自由权利，“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¹不会有这样的自主和权利，消灭了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后的“自由”，充其量是古代人就追求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那种渔翁乐悠然的自由自在。“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个人劳动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²，这种联合体里的个人，只能是实现社会目的的工具。

以根本利益为目的的行为，是以积极的态度从个人当下利益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投身社会整体改造的斗争。这是以赛亚·伯林分析的“积极自由”，是离不开控制和干涉的“自由”。一个人接受整体的控制和干涉，才可能积极投身整体事业。主张积极自由观和积极国家观的格林认为，人类共同生活的准则是集体高于个人，个人的自由必须有所让渡。他说：“真正自由的理想是人类社会全体成员力量的最大化。”³黑格尔也说过：“孤立的个人是某种附属物，因此他必须将自身奉献给伦理整体。”⁴这种一元化的自由观里，个人是“全体”和“整体”的工具，与《宣言》所表达的工具自由观，是相通的。

与“积极自由”相对的“消极自由”，是他人不妨碍自己的选择的自由，保证每个人有一个自由的范围。每个人自己做什么事，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成为什么样的人，都不受

¹ 马克思《资本论》手稿（1857-1858年）。

² 马克思《资本论》。

³ 托马斯·希尔·格林《论自由主义立法与契约自由》，1881年。

⁴ 引自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90页。

干涉控制，没有外在目标指引。这种自由观与康德的纯粹理性相通。哈耶克也说：“自由要求允许个人追求他自己的目标：所谓自由的人，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的共同目标束缚的人。这种个人决定的自由之成为可能，是因为规定了明确的个人权利（例如财产权），并界定了每个人能够把自己所掌握的手段用于个人目标的范围。也就是说，为每个人都规定了一块公认的自由领地。”¹与哈耶克的自由认知相反，《宣言》的“自由”主张联合体的共同目标，强调每个人被共同目标束缚的必要性，而消灭私有制正是消灭自由的领地，是以共同目标束缚个人的制度保证。

消极自由是多元主义的，每个人的自由都不被整体控制和干涉，每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权利都不受整体的侵害，免于恐惧，免于洗脑，自由思想，自由言论，不允许任何人把自己的兴趣——比如对共产主义的爱好——加在别人头上，要求别人做他说的符合他们根本利益的事。罗尔斯称这是良心的自由，是居于首位的自由。

总之，《宣言》说的联合体里的“自由”不是人的自由，而是根本改造社会的集体主义能力，建立这种能力的方法是通过对人的改造，消灭人的自由。🔥

2018年 7月

【红色文化解读】

红与黑：毛泽东时代的新文化

——电影中的人物

启之

就视听语言而言，毛泽东时代带给影坛的最大变革，就是银幕形象的全面更新。1949年以前影坛上的正面人物——市民、武侠、知识分子等被扫地出门，让位给工农兵和革命干部。而与他们配戏的反面角色，也换上了清一色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国民党、旧知识分子、传教士、美国兵等。前影坛正面人物的退出，意味着城市文化的消退，而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上场，代表着农村文化的成功。这一更新遍及整个文艺界，它标志着一种新文化的兴起。

¹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69页。

一 工农兵成为正派主角

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艺术规范——“以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内容”，在激发了文艺界创作热情的同时，也给文艺家，尤其是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家们，带来了困惑：以工农兵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内容，就意味着工农兵是文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那么，自五四以来文艺创作的传统角色——小资产阶级、城市市民能做正面人物吗？

第一次文代会刚刚落幕，《文汇报》就把这个大问号画了出来——1949年八九月间，该报开展“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这场讨论是由1949年8月22日《文汇报》的一则新闻引起的。这则新闻引述了文代会代表陈白尘在上海剧影协会报告中的一段话——“文艺为工农兵，而且应以工农兵为主角，所谓可以写小资产阶级，是指在以工农兵为主角的作品中，可以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物出现”。¹8月27日，电影编剧冼群投书《文汇报》提出不同看法，他以《讲话》为根据，从三个方面反驳了陈白尘的说法，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一、为工农兵服务，“并不就是说完全不应该或不能够也为了小资产阶级（虽然是次要的）”。二、只要立场站对了，作家不但可以写小资产阶级，还可以写反动派，写帝国主义。三，可以写小资产阶级，“这并不等于说，鼓励大家只写小资产阶级，或是拿写他们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²

7天后，陈白尘在《文汇报》上发表短文《误解之外》，回应冼群，说新闻报道与他那天的讲话有出入。他的原意是分主次的，首先是“在整个文艺创作里讲”，专门描写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作品，不应该占太多的分量，按照人口比例计算，应该控制在百分之十以内。其次，他才主张，“在一般作品里，也不一定是专写工农兵的；城市小市民、知识分子等等也出现的。但问题在于着重在哪儿——也就是说，应该谁做主角呢？”他认为，应该由工农兵做主角，而不是小资产阶级。为了证明这种观点的权威性，陈白尘还补

¹ 见《剧影协昨开会欢迎返沪文代》，载《文汇报》1949年8月22日。

² 冼群：《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载《文汇报》1949年8月27日。

充说：“这意见其实并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周副主席（恩来）在文代会上发言的传达。”

在此后的两个月中，《文汇报》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参与讨论的人们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以冼群、黎嘉、张毕来等人为代表的多数派认为，问题不在于你写什么，而在于你怎么写。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是可以作为主角的，只要你批判地写就行了。以乔桑、左明等人为代表的少数派坚决反对多数派的主张，理由简单得近于蛮横：“不仅我们的文艺写作要为工农兵服务，所有一切的一切也都是要为工农兵服务。”¹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派的思维方式，他们不是从文艺角度，而是从政治立场——阶级的思想意识上来判别是非。用左明的话说，就是“好多作者们所以关心这一问题，正说明了他们还没有能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的支配，不自觉地做了旧思想意识的俘虏。”²

同年11月，何其芳在《文艺报》上发表长篇论文，代表主流话语对这场讨论做了总结。他并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貌似公允地对两派进行了批评。结论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过去的文艺忘记了这一点，无产阶级文艺要把人民作为自己的主角。与左明等人一样，他用政治立场代替文艺观点，把多数派视为小资产阶级。³

三个多月的讨论，主流话语一锤定音：一、因为人民是历史的主角，所以也应该是文艺的主角。这个主角当也是正面人物。而人民，当然就是工农兵。二、不管作家站在什么立场上去描写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不能作为主角，不能成为正面人物。而小资产阶级，指的就是知识分子。

对于国营电影厂来说是没有这些困惑的，他们一开始就在坚定地以工农兵为正面人物，为主角。在此后的两年中，文艺理论界将正面人物与英雄人物挂上了勾，这一说法由1950年由后来当了电影局局长的陈荒煤率先提出，1952年在《文艺报》发起的“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中得到确立。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在主题报告中将正面人物与英雄人物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对正面人物的写法有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决不

¹ 左明：《对“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看法》，载《文汇报》1949年9月8日。

² 同上。

³ 何其芳：《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载《文汇报》1949年11月26日。

可以把在作品中表现反面人物和表现正面人物两者放到同等的地位”。第二，为了树起正面人物的高大形象，应该“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¹

对于私营影业来说，要把他们熟悉的人物赶下银幕，还有一个过程，1950年，文华影业拍了《思想问题》，讲华北革命大学中的一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进步的如何帮助落后的。1951年，昆仑影业出品了《我们夫妇之间》，描写了出身于城乡的知识分子，因不同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发生的碰撞。1952年，长江昆仑影业推出了《劳动花开》，影片以一位有姓无名的张工程师为主角，讲述了在党的领导下，张工战胜保守思想，将白煤车设计成功的故事。随着私营影业公司的合营，这类人物从银幕上消失。他们再次出现是在三十年后，张工成了蒋筑英。

只能以工农兵为主角，极大地束缚了文艺的生产力。1957年4月，深知这一点的夏衍借着“鸣放”的机会说了几句纠偏的话：“我们的电影必须始终不渝地为劳动人民服务，因此就必然要写劳动人民的题材，但是，这决不能被了解为电影只能表现工农兵题材。电影的题材应该十分广泛，应该从各方面来反映我们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以满足观众的多方面的要求。”²夏衍是聪明人，他并不直接谈人物，而是躲到题材后面，从观众角度来减少银幕上的工农兵。几年后，邵荃麟提出的“写中间人物”，可以看做是这种共识忍无可忍的喷发。

对于反面人物的定位，文艺界没有困惑，更用不着讨论，无论延安来的，还是国统区来的，所有的文艺工作者对此都心知肚明。按阶级斗争理论，地主、资本家、国民党、美国兵、传教士都理所当然地成为反面人物。接下来的问题是，对这些先天性的反角，是如实写来，还是污化、矮化？妖魔化呢？换一句话说，是为了让人们对生活有更真实深刻的认识，还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于他们的仇恨和警惕”呢？³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

¹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文艺报》，1953年第19号。

² 夏衍：《加强团结，改进电影工作》，《夏衍全集》第六卷，页295。上海，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³ 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文艺报》1953年19号。

值得安慰的是，还有极少数人想到了不要神化正面人物。1949年张怀瑞（阿垅）在《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中就“明确反对在文学创作中把‘正面人物’神化，并认为：文艺不能仅仅以工农兵为艺术人物而不描写其它阶级，因为‘其它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也是这里那里地各式各样地活动，因此在文艺上有作为一定主角的资格’”¹。1952年，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茅盾在强调人物性格的时候，也提到了避免神化正面人物。

此后的文艺实践证明，无论是想到，还是没想到，丑化反面人物，神化正面人物成为毛时代文化市场的不变的需求。

二 人物的意义结构

虚构世界的正反人物不但反映了现实世界的新秩序、新规则，而且构建了新的意义结构。这个结构涉及到三个方面：一、观众对毛时代的中国社会的认识，二、观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民粹主义的认识，三、银幕上的正反人物对不同出身的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

通过对银幕上的正反人物的认知，观众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也有了明确的认知——工农兵代表了新政权/共产党，地富资本家等代表了旧政权/国民党。新政权是正面人物的靠山，旧政权是反面人物的后台。

认知之后是认同。观众认同了银幕上的正反人物，也就认同了主流话语对这些人物的定位，同时也就接受了阶级斗争、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等意识形态。工农联盟的新规则与“劳工神圣”的左翼传统结合起来，使民粹主义深入人心。随着中共以工农兵建政，工农人大代表涌进大会堂，工农兵在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的同时，也垄断了是非、善恶、美丑的裁判权。银幕成为新兴的法庭，“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等等说法，成为思想文化界最高的法律条文，一个新的评价体系巍然屹立。

¹ 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页96，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

1950年文华影业公司拍了一部描写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学员们进行思想改造的影片《思想问题》，片中最重大的思想分歧就是对劳动的看法。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周正华反对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校党委的女主任陈绮开导他：“我问你，原始社会没有大科学家，也没有哲学家，更没有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世界是谁创造的呢？从茹毛饮血发展到畜牧种地，又是谁创造的呢？推而广之，整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今天我们所以要特别重视以工农为主的劳动人民，也是因为他们才是创造者，人类历史的主人。科学家不过是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罢了。”听了这番话，周正华博士放弃了原来的观点，由落后而进步。

传统的伦理道德崩溃，工农身上的缺点毛病也成了优秀品质。正反颠倒，观念更新。从此，脑力工作者低人一等，知识文化成了原罪。改造思想成为知识分子的日课，与工农相结合为后来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做了精神铺垫。

以这种理念为后盾，江青对戏曲界发出这样的质问：“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良心’何在”？¹戏曲界自觉罪孽深重，赶紧上马京剧现代戏将功补过。电影界一方面庆幸自己还有点“良心”，另一方面把所有的戏曲片全改成了反映进步与落后、表彰好人好事的现代戏，²以表示自己站对了阶级立场。

列宁说：“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电影。”银幕上的工农形象唤起了工农大众的主体意识，使他们产生了自己是国家主人翁的错觉。这种错觉给了他们莫大的满足感和感戴之情，效忠党与领袖的情感随之而生。与此同时，银幕上的工农和城乡也屏蔽了实际生活中工农、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从而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工农是平等，城乡之间只是地理的不同。

¹ 1964年6月23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召开了座谈会。这是江青在会上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这些话是江青讲话中的。1964年6月26日，毛泽东对这个讲话有明确的批示：“已阅，讲得好。”

² 1965年电影界拍了12部戏曲片，无论是锡剧、川剧、豫剧、楚剧、花鼓戏、二人转，还是河南越调，都是现代内容，或表扬好人好事，或宣传英雄模范，或弘扬共产主义风格。1966年拍了4部戏曲片：《送粮》是祁剧（未发行）讲的是革命历史，河南曲剧《游乡》、汉剧《借牛》、《一袋麦种》三部戏讲的全是进步与落后的故事，其中还有两部未发行。

银幕上的正面人物也教育了观众，使他们把工农看到了自己的人生榜样。工农兵及革命军人革命干部从银幕中汲取了荣誉感，优越感，“长大要当工农兵”并不仅仅是贴在墙上的宣传，更是一代青少年的心声。银幕上的“黑五类”成了大众的教科书，他们提供了对旧社会的解释，强化了新社会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青少年从“黑五类”身上看到了旧社会的丑恶与不义，知道了这些人对新生活的危害。培养了仇恨，发现了敌情。“黑五类”及其子女则从银幕上得到了负罪感。在现实生活中，地富右派们在苦海中挣扎，他们的子女则投入到揭发父母，划清界限的时代大潮之中。

毛时代对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硬性规定，背离了历史和现实，将银幕变成了一个两极化的世界，正面人物为一极，反面人物为另一极。两极之间一片空白，“红”“黑”之间没有过渡色，十七年生产的527故事片，¹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黑白片”，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好即坏，非善即恶，黑白分明的画面。

三 人物的代码与功能

正面人物是一个群体，除了工农兵之外，还包括工厂、农村、军队的干部。尽管革命的知识分子卢嘉川、加拿大友人白求恩、苏联专家西蒙诺夫、农民起义者宋景诗、周大，古代劳动人民的代表鲁班、李时珍；以及反抗外国侵略的林则徐、丁汝昌、邓世昌，也会偶尔出现在这个队伍里。但是，人民电影的基本面貌，只能由正面人物的主体——工农兵决定。

根据叙事学的代码/功能规则，人民电影中的正反人物，从大的方面说，可以编为主体、客体、授命者、辅助者、阻碍者这五个代码。

一、主体，即影片主角的工农兵。他们是旧中国的破坏者，新中国的建设者，是电影母题的承担者，是接受授命者（党）指示的人。授命者是他们的靠山，辅助者（积极分子）

¹ 这里的故事片不包括古代戏曲片、童话片、神话片、节目歌舞和未发行者。但是包括歌剧、话剧、舞剧、现代戏曲片和《美国之窗》一类的中国人演的外国片，以及中法合拍的带有梦幻情节的《风筝》。

是他们的群众基础，阻碍者（保守势力或阶级敌人）为他们增加了困难，也激发了他们的勇气和才干。其功能大致如下：

1. 示范功能——他们是技术革新的能手，是农业集体化的标兵，是战场上的勇士，是为共产主义理想艰苦奋斗的先驱。他们用自己的事迹，唤起了观众的英雄主义的浪漫情怀，激发了人们对革命，对斗争的想像，从而成为人生榜样。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众多文革日记的作者告诉我们，银幕上的工农兵不但告诉人们，怎么做事，怎么做人，还为他们选择了生活道路，确立了人生目标。

2. 依附功能——主体的成功是授命者支持的结果，换言之，党的领导是技术革新、集体化和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通过对主体与授命者这种关系的描写，影片告诉人们，只有从人身到思想全部依附于党和领袖，才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二、客体，即主体的对立面，也就是影片中的反面人物。与正面人物一样，反面人物也是一个群体。除了“黑五类”之外，还有资本家、国民党军政人员、台湾派来的特务、美国军人、传教士、地主的管家、狗腿子，私企的经理、工头、打手，黄色工会的成员等等。地富反坏右是反面人物的常驻代表，他们适用于各种题材，是绝大多数故事片中的“硬通货”。客体至少有三种功能——

1. 解释功能——在1949年以前的主流话语中，上述大部分人物，比如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军政人员、美国军人、传教士、私企经理等，作为个体可能会成为文艺家批评的对象，但是作为阶级、阶层或整体，这些人是社会精英，在媒体中是被肯定的正面形象。毛时代的文艺将这些人划为反面人物，等于建立了一套新的评价体系，历史也随之有了新的解释。

通过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毛时代的电影告诉人们：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是黑暗的、腐败的，是必须用暴力推翻的。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他们与官府勾结，压迫百姓。他们豢养的走狗是旧社会的基础，必须打倒。在国民政府中做事的公务员，尤其是军政官员，全是反革命。外国的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美国军人是派来协助国民党镇压

革命，残害人民的帮凶。通过重新解释历史，为新政权找到了正义性与合法性。

2. 仇恨功能——反面人物是电影母题“新旧对比”的主要承担者，正面人物的“忆苦思甜”一定要有反面人物配合，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反面人物就一定要做坏事：地主上门逼债，夺人妻女；资本家延长工时，不顾工人死活；国民党军队残害百姓，美国士兵强暴妇女，传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破坏学运……设定这些角色就是要唤起人们的仇恨心，仇恨他们所在的阶级和社会，仇恨他们赖以生存的制度和文化的。

显而易见，反面人物也是“狼奶”的主要制造者，“阶级斗争扩大化”要靠反面人物来完成。而痛斥“狼奶教育”的人们，似乎并没有认识到地富反坏右在“红色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当年，为了防止愤怒的士兵枪击舞台上的黄世仁，部队规定，看戏不准带枪。红卫兵并没有枪，照旧在四十天内，打死了 1772 五类分子。

3. 警示功能——反面人物另外一项任务，就是让阶级斗争的警钟长鸣。毛时代的银幕通过对反面人物的塑造，不断地重复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神话，不断地提醒着人们，被打倒的阶级，人还在，心不死。电影院成了渲染危机感的课堂。

三、授命者，即向主体发出指令的人。具体而言，就是工厂的厂长书记，农村的支书、县委书记以及军队中的指导员、政委等等。总之，就是党的基层领导。在十七年生产的 527 部故事片中，除了五十年代初拍的《表》《二百五小传》和几部控诉美军的短片之外，至少在 510 部影片中都可以看到授命者的身影。在影片中，他担负着两种功能：

1. 承上启下的功能——授命者的任务就是向主体传达党的思想意志。也就是说，授命者是一座沟通上下（党组织/领袖与人民）的桥梁，他的作用就是承上启下。因此，授命者同时也是被授命者；换言之，他也具备主体的依附功能。

2. 真与善的化身——授命者代表着真理与正义，技术革新的工人得到他的支持，农业集体化的带头人得到他的帮助。当主体遇到困难的时候，授命者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主体的面前，给他们撑腰打气，为他们撑腰打气。客体的所有阴谋诡计都会被授命者识破，授命者的主意，总是正确又正确，授命者的用心，总是充满了仁慈和善意。

四，辅助者是工农中的积极分子，他们的任务，一是把自己变成“绿叶”，让主体成为“红花”；二是让观众知道，凡是党支持的事业，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也决定了辅助者的功能：一协助主体，二彰显党/毛的英明。

五，阻碍者是给工农中的落后分子，他们的任务，一是给主体设置困难，以表明主体取得成功的不易；二是给影片增加戏剧性，以吸引观众。而阻碍者的功能也正在其中。

上述代码同样存在于别的电影之中，它们的功能大同小异。🔥

【书摘】

毛泽东的外交指导思想（一）

何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头30年的外交，完全以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为指导。不仅如此，周恩来还确立了“外交无小事”的原则。这就使毛泽东的乾纲独断，在外交领域可以做到从大政方针一直贯穿到细枝末节。

正如胡耀邦所说，毛泽东1973年讲“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送，此风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对周总理是不公平的；应该改为：“大事不敢讲，小事必须送，如果不照办，势必打修正¹。”头30年的外交，完全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实践。从1949年10月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是27年，之后还应加上三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华国锋继任的两三年和邓小平开始管事的头几年，先后在对外开放方面向前迈开步子，但他们对时代与形势的观察判断和奉行的外交政策却同毛泽东保持着传承关系。最明显的表现是对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态度。毛泽东坚决支持，华国锋继续，邓小平更进一步，到1979年初还为了保护它出兵同越南打了一仗。至于对世界形势的估计，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也没有改变毛泽东对大战危险和所谓苏联是大战主要策源地的判断。因此，说毛泽东的外交

¹ 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

延续了30年，应该还是没有争议的。而且，观察国际问题和做外交决策的一些出发点，这30年的影响还一直延续到之后。

这里谈的正是这30年，特别是头十年的外交。主要谈头十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头十年是共和国外交全面建设和奠定基础的时期。举凡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外交工作的开展、外交干部的培养、外交风格的形成，都是在头十年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从个人来说，对这头十年外交工作也有亲身体验，其间一半是在驻苏联大使馆，一半是回到外交部。特别是回到部里的五年，一直兼任部党组书记，更有利于对全面情况的了解。

一 共和国头30年的内政与外交

共和国成立60年，无论内政外交，都应分为前后不同、各为30年的两个时期。前者，因为毛泽东在世实行独裁专制，所以被称为毛泽东时代；后者，因为实行了改革开放，往往被称为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一些国际关系和外交问题学者还干脆称之为邓小平时代。两个时期既有密切的传承关系，主要表现在政治和文化上，诸如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实行皇权专制主义和个人独裁、从严控制舆论和限制一切自由等；又有显著区别，主要是在经济和外交上，表现为：前30年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下，对内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对外奉行输出革命、推动世界革命的路线。这导致中国长期背离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在二战后世界大发展的形势下丧失了最好的机遇期，造成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绝对下降，在国际社会中被边缘化而沦为世界上保守落后的专制独裁大国。后30年则是在邓小平的管控下，虽然政治上仍然坚持党国体制和个人独裁，在经济上却改为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实行对外开放和在党控制下的市场化。这就使中国竟然在躲开民主化大潮的情况下，还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国际社会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

人们说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在共和国外交史上也表现得特别明显。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更是对内对外高度一致，而且他还善于利用以至制造一些外部事件来配合对内加强专制独裁的需要。

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国内，全盘否定民国时期的内政外交，几乎事事反其道而行。在国际上，试图否定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处处与之划清界限。国内要实行向社会主义的穷过渡，对外关系就实行“一边倒”，即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对非社会主义国家则坚持“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使共和国长期自我孤立，自外于由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社会，未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参加联合国等重要的国际组织。

开展政治斗争也是内外直接联系。取得执政地位后，毛泽东仍然视政权为革命的根本问题，继续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保护政权，实际上是保护一党专政体制和他个人的领袖地位，并以此为第一要务。一旦自感他的个人权威受到或可能受到挑战，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就会被他视为敌对势力。在国内，就是历次被他打成“反党集团”成员的高层领导人，共和国成立以来被定为各类“分子”的民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在海外，就是“帝修反”各国及其代表人物。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对内反右倾和对外反对“修正主义”同时开动，把内政外交完全搅和到了一起，所以才有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及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上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里通外国”的毫无根据的追查，也才有和苏共分裂的迅速走向公开化。

为了对内的政治需要不惜损害对外关系的类似思维和作法，还表现在常常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并提。国内出现任何乱子，无论大小，总要追查所谓的外国背景。这种内外联系也表现在对从高级领导到一般干部以至广大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政治排队上。毛泽东一直赞赏邓小平的坚决“反修”，多次指斥周恩来在台湾问题、对美国态度和一些外交活动上“太软”。在实行对苏联“一边倒”政策时，1957年确定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中有一条是

反对苏联；但在和苏联闹翻后，有在苏联留学或工作经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又大批受到猜疑以至监控和迫害。外交部给干部做鉴定，政治上是好是差，包括对美对苏的认识和态度。1951年是对美、1964年是对“苏修”。这些都说明内外因素的互相影响，上面的指导思想就更是相互混淆而难以分清了。

但是，官方史学和与之保持一律的舆论，却硬要把内政和外交断然分开。如说国内是从1956年以后就犯“左”的严重错误，但外交却一直正确。又如在邓小平、陈云的主持和操纵下，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还特别指出这期间的外交是正确的，并肯定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和所谓“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所以在官方舆论上，虽然承认毛泽东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在国内问题上有所谓“晚年错误”，却一直肯定他在外交上能坚持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执行了正确的方针¹。这就不但违背历史事实，也违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个公认的原理，还直接影响到对外交工作的正确总结和汲取教训。

共和国成立后头30年的路线错误，源于毛泽东对时代的错误判断。对时代的判断正是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但是，毛泽东连如何判断国际形势也要为内政服务，常常过分以至故意强调国际形势紧张、大战危险增加和外部敌对势力对国家安全威胁的严重。他直言他是喜欢国际形势紧张的。形势一出现缓和，他就要搞点紧张。在1956年以前，还偶尔可见毛泽东的“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1950年6月6日）²、“国际的局势已趋向缓和”（1956年9月15日）³这类说法。此后就再也见不到了。

外交既然是内政的延续，要想说明头30年的外交，就得首先简略交代一下头30年的内政。

必须承认，共和国成立后头30年，毛泽东在内政上犯了严重错误，执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历史上少有的灾难和祸害。

¹ 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

²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391页。

³ 同上第六册第203页。

毛泽东在成功地领导党夺取到国家政权以后，恰逢世界经济科技进入空前快速发展时期。这给各国都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对毛泽东来说，理应领导党彻底改变战略策略，着手党的自我改造。党的任务应从革命变为建设。地位应从统治变为领导。应该消除党的秘密帮会性，实现党的现代化。治国应从领袖独裁改为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应放弃愚民政策，转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应保障新闻、出版自由以及公民的言论、结社、迁徙和信仰自由。但毛泽东却领导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反世界潮流而行。以各种人祸推动历史倒退，甚至导致在正常年景饿死农民三四千万，打破了中国和人类历史的记录。

共和国成立后随即建立起共产党一党专政下的专制体制和个人独裁，使中国人民一直处于专制独裁统治之下，享受不到自由民主权利，两次错过二战后掀起的世界民主化潮流。“新中国”的专制统治，比过去的国民党“旧中国”还要严格和彻底得多。在言论、集会、结社、罢工、迁徙等几方面的自由，也比“旧中国”更少。中国的进步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原以为，共产党打下江山，人民会得到解放，会享受到自由民主，会丰衣足食，过上好日子。因此他们积极欢迎、支持和参与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正如柳亚子诗文描写的：“伫看荼火军容盛，正是东征西怨时”。但是后来的事实却让他们大失所望。人们得到的只是一个集中国皇权专制主义传统和斯大林独裁模式于一身的专制独裁统治。居于这个政权金字塔顶端的“伟大领袖”，成了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历史上权力最大、管辖范围最深最广、也最残暴的独裁者。文革结束后召开理论务虚会，时任副总理的方毅在发言中就说，“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暴君。”记录整理人员问：“这句话能不能写进上送的‘简报’”？方毅答复说，“我既然讲了，当然就不反对将这个话刊登在会议简报上。”

毛泽东对内执行了错误路线，表现在对外方针上当然也只能是错误的。这不仅是逻辑推理，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我们革命夺权成功后，对外并没有改变推进世界革命的路线。这不仅严重制约我们开展正常外交，反过来还阻滞我国国内的各方面发展。

二 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理解

讨论共和国的外交，不先谈一下它的指导思想，许多问题就不容易说清楚。而共和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所有共产党专政国家的共同现象，根源都是搬用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模式），就表现在意识形态的基础地位和领导人的个人作用上。一方面是几乎一切外交问题都由领袖决定，另一方面领袖的意志又往往以意识形态的面貌出现。于是，领袖的个人意志和所标榜的意识形态的结合也就成了外交的指导思想。共和国成立60年来中国外交分成不同的两个阶段，就是由于前后的指导思想不完全相同，因而执行了不完全相同的路线和导致了一些不同的后果。两种指导思想虽然在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上保持相应的传承关系，但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上却存在很大差别。

毛泽东处理内外事务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为了说明毛泽东的外交指导思想，需要先简单谈一下个人对毛泽东思想一点总的看法。

对于毛泽东思想，我个人可以说学了大半辈子，而且长时间都是他的忠实信徒。只是在“大跃进”失败后开始产生一些疑虑，经过文化大革命就完全动摇了原来听信的官方定义和解释，并在后来接触和研究中共党史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立看法。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一篇题为《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地位》的论文中，曾对毛泽东思想做过一个概括，说：“毛泽东思想就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政策¹。”这是套用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的定义，其实是很不确切的。当时的意思只是想说明，毛泽东思想只适用于共和国成立前的战争与革命时代，之后，世界和中国都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它就基本上不再适用了。至于提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则是要说明毛泽东思想的两个主要源头，其实这也并不恰当。下面就谈一下我现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

¹ 见《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第123页。另外，我不同意官方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解释，认为从延安整风时正式提出到文化大革命后作出第二个《历史决议》，其中都包含制造和维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精神，因而不科学，不够实事求是。我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利文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对此作过分析和批评，特别是其中的《提出毛泽东思想也是个人崇拜的重要标志》和《〈历史决议〉为党史编纂学奠定基础》两节。

（一）毛泽东思想的两大来源

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个来源是马克思主义。¹虽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多，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知之甚少，但他终究通过列宁主义的中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着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中一些多少有些消极成分的重要原理，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和推进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等，并能结合中国传统和中国实际进行发挥和创造。由于毛泽东思想继承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列宁主义的中介，所以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有取有舍，主要接受的还是斯大林解释和发展了的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本来就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回事，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左的流派。[关于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我在《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一文中即已指出，后来又在《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一书最后一章中有进一步和较多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这都使毛泽东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本来空想的和消极的成分就多些，有的原理经他的发展更进而走向极端。例如，他把马克思主义完全简单化，说只取其中两条：阶级斗争和造反有理²。他一直崇拜暴力革命，始终反对和平过渡和渐进改良。他不仅按照斯大林模式，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还进一步创造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间断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给人民带来不少苦难。

毛泽东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主义传统。首先，毛泽东很重视中国历代的农民运动（实为游民阶层的运动），并善于从中汲取社会底层人物成就帝王霸业的经验和遭受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就更多的是农民起义的经验总结。受到毛泽东一再推崇的历史人物多是出身于

¹ 马克思从不把自己的学说当作等同于宗教教义的主义，是列宁把它弄成一种排他性的主义并且经常当作棍子来使用的。这一点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继承。这里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沿用主义的称谓。

²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说过，“对马克思主义我只取阶级斗争四个字。”又说，“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造反有理”后来还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口号。

游民阶层的，如刘邦、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这些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所没有的。但毛泽东思想又高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因为它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特别是列宁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理论。

其次，毛泽东熟读中国王朝历史，深谙帝王的统治权术，并能结合实际，娴熟应用。毛泽东所读中国古籍，比起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和近现代文明典籍，不知要多出多少倍。毛泽东自称他超过秦始皇。确实，如果说秦始皇在残暴之外还为中国创造了车同轨、书同文这类有利于中华民族形成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好东西，毛泽东则是摧毁了中国历史上许多好的东西，从思想、文化直到文物精华。

毛泽东思想继承中国皇权专制传统要比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分量重得多。他又把宗法社会和家长制揉进列宁的建党原则中，使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沾染上了会道门组织的某些特色。中共党史专家胡绳晚年曾就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粹主义成分写过专文。他还曾对友人说过，中国共产党像个帮会，毛泽东更像个帮会头子。连斯大林也早在西安事变后毛泽东想除掉蒋介石的时候，就认定毛在用帮会作风代替党的原则。他在1936年12月15日致中共中央的密电中说，如果中共不运用自己的影响释放蒋介石，莫斯科将谴责他们为“土匪”，和他们断绝关系，并面对全世界公开批判。这是宋庆龄1937年11月在上海告诉斯诺的¹。毛泽东自称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说明他并不讳言两大思想来源。只是把他说的马克思换成斯大林可能更确切些。胡乔木在起草“十二大”文件期间，就曾几次私下对他所赏识的李慎之说过，毛泽东很长时间内都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因此，连他本人也不赞成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毛泽东思想的两个阶段

毛泽东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扳倒三座大山（即所谓打倒了帝国主义、封

¹ 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一书中引用了记载有宋庆龄和他谈话的日记，转引自王伟、孙果达《西安事变与斯大林的两份“密电”》，《党史纵横》2013年第8期。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实际上主要是从国民党手里夺得了政权）；二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没有提他在共和国成立后17年所做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情，看来是因为毛泽东夺得政权后就从未想过要变革命为建设。因此，他就把这17年都算到文化大革命亦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去了。或者，他认为17年属于探索，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算找到了前进道路。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感到困惑不解。但是无论毛泽东怎么考虑，作为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一种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却明显地分为共和国成立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

共和国成立之前那一段，可以追溯到大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执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政策，直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前后28年。这个阶段的毛泽东思想，虽然也有极左的和民粹主义倾向，因而犯过不少甚至带根本性的错误，但在推翻国民党统治和夺取政权上，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共和国成立后则相反。毛泽东不顾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仍然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判断，对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弄得国困民穷；经过文化大革命，更把国民经济和整个国家推到崩溃的边沿。对外则使国家长期处于备战状态和孤立地位，落到了世界发展的后面。

毛泽东思想在共和国成立前的阶段，确定和执行发展力量、夺取政权的方针，基本上适应了客观形势，所以实现了战略目标。但此后，毛泽东却进一步独裁专制、一意孤行，使党犯了一系列民粹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性质的错误，要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不但大干社会主义建设，还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当然完全错了，只能以失败告终。

（三）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错误

毛泽东生前特别是共和国成立后所犯的 error 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问题只在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特别是犯错误的时间。对这些问题，官方党史都讲得很含糊。特别是邓小平要竭力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和思想，坚决反对把毛所犯错误定性为路线错误。在时间上，官方的算法是尽量短些，很多人就是从1956年后的反“反冒进”和反右派算起，到文化大革命

结束为止。邓小平也一再肯定 1957 年下半年以前都是正确的（包括邓自己主持下的反右派也基本正确），只在这以后才犯了“左”的错误，耽误了 20 年¹。实际上从共和国成立初期起毛泽东就开始犯重大错误，性质是推行一条完整的全局性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共和国成立后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显然就已极其错误，不然实行改革开放后为什么又得整个儿改过来。有的只算文化大革命，称之为毛泽东晚年错误，连“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和人为造成的三年大饥荒，都不计算在内。对毛泽东错误在性质上减轻、在时间上缩短的不实事求是评估，至今仍然占据主流地位。

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七年，至今仍被官方党史著作大加称道。但正是共和国一成立就确立的专制独裁体制，才使唯意志论和极左路线通行无阻²；正是这些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奠定了以后犯越来越“左”的错误的的基础。把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说成完全正确，并不合乎历史事实。历史已经证明，共和国成立后头几年提出“总路线”和进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就已完全错误。它妨碍经济发展，还成为后来发动“大跃进”以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总根源。三大改造的所谓“成绩”实际上已被完全推倒，这也是国民经济后三十年能够快速发展的历史补课。如果继续坚持“总路线”和“三大改造”造成的局面、拒绝改革开放，那就正如邓小平一再说的，中国也会垮台（其实是指共产党会失去一党专政地位）。奇怪的是，直到现在，官方史学和官方学者还都在肯定所谓的“三大改造”³，认为经过“三大改造”，中国就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人们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坚持这一论断，就等于说实行改革开放是复辟资本主义。你看，在农业方面，实际情况不是正如农民所说，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单干（包产到户）？在整个经济制度上，实行混合所有制和市场经济，鼓励发展私人

¹ 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227、237、266、269 页。但他在另外地方的谈话中又不限于头二十年，如说“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同书第 64 页）。还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要发展生产力。”而毛泽东同志“有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同书第 116 页）。

² 1953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连发两个批示：凡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才能发出，否则一律无效”。并在一律无效四个字下面加上了重点。

³ 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简史》（2001 年），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等。

工商业和个体经济，也是实行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这些不都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的根本否定？“三大改造”怎么能和改革开放相容呢？其实，这七年是在客观上缺乏工业基础、基本还是农业社会，主观上又并不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的情况下，盲目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因而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

接着的十年，并不是第二个《历史决议》上说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而是对国家和人民瞎折腾、接连犯各种更加严重错误的十年。例如在反胡风、肃反、反右派中就错整了几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特别是在基层的干部。紧接着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更使中国生产力和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再加上后来全国规模的大反右倾，进一步造成严重后果，单是和平时期饿死的人就有三四千万，成为人类历史上所仅见，还不算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整死的上百万人。这十年，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决不亚于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毛泽东犯错误还有个特点，犯一次错误后一经其他领导人提出批评和来自下面的抵触，就会刺激他犯新的更大的错误。由于彭德怀、张闻天等对“三面红旗”提出意见，他就发动了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由于刘少奇等正视大规模饿死人的现实，他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都只能造成错上加错，后果一个比一个严重。由此可见，共和国成立后头30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犯了党史上时间最长、后果最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这只能说明，毛泽东思想当然包括毛泽东的错误，否则，共和国成立后接连不断的严重错误，又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犯的？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为起草《历史决议》，曾召集四千高级干部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内容主要涉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讨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时，多数人认为文革前的17年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这条路线的总代表，不同意草稿中对毛泽东错误的掩盖和辩护。有关毛泽东思想的争论，主要是毛泽东思想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还要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很多人认为，说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不包括错误思想，道理上说不通。而且哪些是错误思想，如何划分和由谁决定，也是糊涂账。把别人正确的思想归结到毛泽东思想中去，既不公平也不合理，逻辑上更不通。说毛

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为毛泽东所专有，毛泽东的错误却只属于他个人，不能说是党的错误，也问题搞得更乱。例如，说“大跃进”、反右倾，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无关，那当时的毛泽东思想跑到哪儿去了？当时的指导思想又是什么？总之，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硬行分开，实在说不过去。如果那样说，不就成了在共和国成立后犯错误的长时间里，都是毛泽东在违背毛泽东思想，倒是他反对和打倒的少数人在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不是太荒唐了吗？但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的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做出的决议只是反映了主要领导人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即邓小平、陈云、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意见¹。

如何评估头30年历史，仍然是个大问题。我们在党史和国史的编纂与审定上，实行的也是一元化领导体制，由领导个人定调和拍板，形成为官方的看法，其内容和分寸见之于第二个《历史决议》，以及按《决议》精神写出的大量党史和国史著作。现在距作出《决议》已超过30年。这后30年的实践证明，《决议》不但基本上是错误的，而且《决议》中歌颂的正确决策和辉煌胜利，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甚至灾难。可惜的是，正统史学至今也没有公开地正视《决议》的错误，更不用说对《决议》进行清算了。

综上所述，对《第二个历史决议》论述和评定的毛泽东思想，应当进行以下几点重要订正：毛泽东所犯错误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和国成立后和平建设遭到一系列挫折和失败，是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结果；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也不能再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党章、宪法以及有些党的文献提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那是基于法统和道统上传承的需要，而不是实践的需要）；从犯错误时间之长和性质之严重看，错误成分在毛泽东思想中占重要地位；今后毛泽东思想再也不能作为指导思想来提，这一提法更应从党章和宪法中删去。

¹ 有关这次讨论情况，取材于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纪实》，《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四）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征

系统地提出毛泽东思想并给它下了不少定义的，最初还是延安整风特别是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不过《报告》主要涉及的还是民主革命阶段的毛泽东思想，没有也不可能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运用。也许由于这个报告是制造个人崇拜的标本，再加上刘少奇本人历史地位评价的变化，后来人们已很少提起。但在这之前，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已经提出毛泽东思想。虽然这个《决议》在制造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同刘少奇的报告并无二致，却成为研究党史必须遵守的圭臬，延续至今。不管怎么说，文化大革命以后，毛泽东思想作为和平时期的指导思想遭到失败，却是再也无法掩盖的了。但这涉及党的领导和政权的传承，因此必须及时设法弥补，对历史做到自圆其说。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等少数领导人急于制定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原因。这个决议的使命也就是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然而面对27年的失败，不论是对毛泽东思想还是毛泽东的评价，都不能不适当降低调子。例如不再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同时还必须承认毛泽东犯过全局性的错误，只是要勉为其难地评他功大于过。

邓小平、胡乔木等人主持起草和审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讲了六项内容。应该说这种讲法很不准确，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仍然保留了一些民粹主义精神。至于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所谓“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看来更不妥当。因为这一归纳太抽象，也不为毛泽东思想所独有。例如实事求是，可说一般人都是能够和必须做到的。像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不实事求是行吗？更不用说一些科学家和成功的政治家了。比较起来，毛泽东反而做得差些。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有哪些是实事求是的？又如群众路线，作为工作方法，也是许多人都做到了的。甚至中国过去的一些开明君主也讲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采风”等办法了解民情。谈到独立自主就更空泛了。世界上除了半殖民地和附庸国外，所有国家都以独立自主为立国原则，更不用说那些大国强国了。把这样几条普

遍原则归纳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实在没有意思。何况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缺陷，包括独立自主这一条。因为受国际共运约束的“一边倒”和后来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都不能算作独立自主。所以邓小平才事后说，“我们过去曾说过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18页。]实际上只是到了1982年党的“十二大”，胡耀邦才在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

那么贯穿两个阶段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根据个人的理解，似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提倡和信仰“斗争哲学”，把斗争绝对化

毛泽东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从青年时期提出“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到晚年声称“八亿人，不斗行吗？”斗争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写书提到1976年初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情形。毛对她说：“年轻人吃不了苦，要告诉他们需要斗争……党内要有斗争。阶级和阶级要有斗争。除了斗争，什么都是靠不住的¹。”

他讲“一分为二”，只强调事物的对立：相互排斥，“你死我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被吃掉”。断然否定事物的同一与融合，排除政治上的妥协、和谐共处与团结。苏联哲学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提出对立面可以“融合”。1963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毛泽东批判杨，连同周恩来在外交上提出的“求同存异”也一块儿批了。

民主革命时期，在党内，靠发动路线斗争吃掉各方对手，包括潜在的对手，取得了领袖地位；在全国，靠武装斗争吃掉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政权。共和国成立后，不断发动各种政治运动，除了吃掉真正反对新政权的势力，还吃掉大批根据专制政治的需要认定的“敌对势力”，包括：党内高层中被认为有可能挑战他最高权威地位的人物，党内和社会上一切不拥护他的专制独裁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

¹ 转引自王若水著《辩证法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一文。

体现在外交上，就是提倡“三斗一多”，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要强调斗；要多援助反帝力量、马列主义及其他革命的政党和派别。[毛泽东1964年2月9日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把“三斗一多”说成是中国的外交方针。]

2. 坚持专政体制

“马上得天下”也要“马上治天下”，即完全按照革命战争的路数治国，斗争方式也倚重由强力部门来强行制服乃至暴力镇压。取得政权后，毛泽东还说过：“反革命杀了一百万……，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3版，第302页。]他还一再以“坑儒”数量超过秦始皇百倍而自炫。

对外，推进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专制独裁的路线。一要坚持通过暴力进行世界革命，二要本国经常立足于准备打仗。因为他坚信，“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对所有国家都否定它们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他主张从军训、军援直至出兵，积极帮助亚非拉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

3. 唯我独尊，坚持个人崇拜，执行以个人意志治党、治国的方针

延安整风创建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就是个人崇拜体制，或叫金字塔体制。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还涂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使人们不仅慑服于他的权威，还得服膺他的思想。他没有“帝师”，本人就是全体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的领袖和导师。他的“朕即国家”，超越了中国的历代皇帝。

唯我独尊还表现在以个人好恶对待国内外领导人。在国内，在高层领导中发动政治斗争，毛泽东可以毫无根据地给那些他早就心怀疑忌的一些领导人如彭德怀、张闻天等，安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并借此使这些领导人在政治上翻不了身。对外国领导人，凡是他所反对的人，也要和他反对的中国领导人连在一起，称之为“里应外合”、“互相呼应”。

毛痛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和批评中国的“三面红旗”，因此给他戴上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被他视为政敌的刘少奇也就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张闻天1954

年如实反映了苏联开始批判个人迷信。他在离任时受到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全体苏共政治局委员饯别，这与王稼祥离苏回国时没有得到这种规格的欢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两件事引起毛的极大猜疑，成为1959年批判张闻天“反对毛主席”和“里通外国”的一个由头。

其实，这个猜疑只是说明毛泽东不懂国际外交惯例而已。因为王稼祥那次离苏属于回国述职，后因病未再赴任，才改派张闻天继任大使。苏方对王、张离任回国是完全按他们自己的外交规矩处理的。毛不懂外交礼节，主观认定是苏方因两人政治态度而有意区别对待。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对王稼祥也并不信任。批所谓“三和一少”，就是对王稼祥产生了类似的猜疑。这也与王稼祥引用了苏联的经验教训直接相关。王稼祥1960-1961年要阎明复查找苏联以往的农业公社如何垮台、农业集体化受挫折时如何推行责任承包制，这就犯了大忌¹。1964年毛泽东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也被认为与此前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提出对立面可以融合相关，都是为了给赫鲁晓夫的“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制造理论依据。

外国主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态度，直接影响中国同这个国家的关系，除了赫鲁晓夫，还有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尼赫鲁触犯了毛泽东的尊严。特别是1959年在我国驻孟买领事馆门前发生了进行游行示威的印度反华群众损毁和焚烧毛泽东画像的事件，引起毛泽东极大震怒，除了提出一百年也不罢休的严重抗议外，[事发后毛泽东亲笔修改外交部起草的照会稿，不但第一次给印度戴上了“扩张主义”的帽子，还加了一段外交文书上少见的情绪化的话：“这件莫大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事件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极端地不能容忍的，必须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否则不可能罢休。如果印度当局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奉命申明，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印度方面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不圆满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奉命永远不能停止，就是说一百年也不能停止。”]毛还给尼赫鲁戴上了“半人半鬼”和“反动派”的帽子，中印关系也从此由友好变为敌对。

毛泽东对待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的态度是又一个足可说明问题的例子。1966年3月宫

¹ 《阎明复：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杨文、裴小敏主编《被历史忽略的历史》，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

本显治到北京时毛泽东正在上海，就先由刘少奇和彭真同他会谈。刘少奇在这之后主持中央常委会就两项外事问题做出决定：在中日（共）联合公报中为照顾宫本显治和日共在中苏论战中持中立态度而不点苏联的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这两个决定当即被毛泽东否定。参加会谈的王力认为，如果就事论事，这两个决定本来无可厚非。只是这时毛正准备拿下刘、彭，有意借此给他们两个人脸色看看。宫本到上海后和毛泽东会谈时，毛告诉他，苏联已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党已变成资产阶级党、法西斯党，要他在中苏分歧中支持中共反对苏共，宫本不同意。结果中日两党当场闹翻，没有发表联合公报，关系也从此长期中断。直到毛泽东去世多年后中共公开认错，两党才恢复关系。

4. 鄙视现代文明，否定普世价值

(1) 否定植根于尊重个人生命、人性和人权的普世价值。从来不把广大民众的生命放在心上，但极为重视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崇拜和服从。在他眼里，党员只能做驯服工具，百姓只能当浑浑噩噩的顺民。

(2) 否定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普世价值，把民主、自由、平等说成是虚伪的；断言西方政治落后、腐败、低级趣味。

(3) 否定法治，自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公然说：从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还要破除宪法迷信。因此，在当时的中国，宪法制定是制定了，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是要以党的指示为准。1968年7月他告诉文革五大学生领袖：“法律恐怕还是不要学的好。”还说，“有相当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守规矩些……我们打过游击，野惯了。那么多规矩，令人难受。”不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就是为了可以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无法无天。他公然地这样说过，“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该有多好啊！不承认我们，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¹

(4) 反知识反科学，反对现代教育，鄙视知识分子，欣赏游民文化。提出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读书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的歪理邪说。他

¹ 千家驹在自撰的年谱上说，这是毛泽东1949年刚进北京时在香山对民主党派领导人说的。

蔑视大学教育，说“阶级斗争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对文革五大学生领袖说：“我看知识分子最不文明，我看大老粗最文明。”

这一切决定了他在意识形态上瞧不起西方先进和发达的一面；把作为“世界农村”的穷国、小国、发展中国家视为在国际上的盟友；在国际和外交上不愿受既定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要我行我素，自搞一套。（未完待续）

【何與懷评论】

“碰瓷：这个“专利”不光彩

何與懷

今年9月1日晚，中国游客曾某以及他的父母亲三人与瑞典警察发生冲突，成了舆论热议话题，不但在中国国内，也在世界各地华人，甚至还超出华人范围。有一个瑞典人拍的现场视频，在瑞典电视台 SVT2 播出，视频中大妈舞着红丝巾扑地大喊救命的动作，格外引人注目。不少外国人极其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在要求得不到满足时经常坐地撒泼？这怎么可能竟是一种被社会认可的行为？”这个事件，让外国媒体发明一个新名词：“helpless collapsing on the ground technique（无助倒地技术）”。但此词是有问题的——“technique”，需要某些技巧，似有敬意，起码是中性，而且“helpless collapsing”，还令人同情。到底是外国人，词不达意，整个英文听起来文绉绉的，不知所云，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还是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形容此等手段，中国民间有一个已用多年的词，简单明了：“碰瓷”，音译简称为“peng c”，所谓的“c”指的是“china”（瓷器）。2012年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增收新词语和其他词语 3148 多条，其中就包括“碰瓷”。

据传，“碰瓷”本为清末北京古玩行的行话，专指古玩市场的一种讹诈手段。不法摊主在器物的耳、柄上做手脚，顾客轻轻一拿，或柄或耳，即断；或别有用心地把易碎裂的

瓷器往路中央摆放，专等路人不小心碰坏，借机讹诈。也有人说此骗术来自老北京没落的八旗子弟，他们平日手捧“名贵”瓷器行走于闹市街巷，瞅准机会故意让马车“碰”他一下，瓷器随即落地摔碎，便缠住车主要求按名贵瓷器的价格赔偿。疑似因为此种勾当不光采，相关文字记载少，好事者只查到两则，见于创刊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申报》（原名《申江新报》），大概是“碰瓷”可见的最早文献。他们还发现，“碰瓷”本非近百年来民间唯一的专利，“碰瓷”不止是去“碰”具体的“瓷”或其他什么物件那么简单，清代甚至还有骇人听闻的“以尸讹诈”连环大案，手段精密残忍，令人目眩心惊。《红楼梦》第44回写到，贾琏趁王熙凤生日与鲍二媳妇私通，被凤姐撞破，鲍二媳妇上吊自杀。他娘家亲戚深知贾家大户有钱，借机闹大要告到官府，以为可以大捞一笔，不料刁钻刻薄的凤姐强势回击道：“我没一个钱！有钱也不给，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许劝他，也不用震吓他，只管让他告去。告不成倒问他个‘以尸讹诈’！”就是这种碰瓷案的写照。

看来“碰瓷”也算一种“国粹”，怪不得多少年来此等见怪不怪的事件在中国时有所闻。特别最近十多年，碰瓷者花样翻新，碰瓷之术与时俱进，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各类媒体中此类新闻天天可见。研究者总结出，现在，在“瓷”的意义泛化、抽象化的基础上，“碰”的意义弱化，碰瓷者假装弱者，只要欲求得不到满足，就坐地躺地哭闹撒泼，索要经济赔偿或提出其他要求条件。总之，现在碰瓷即使尽计谋手段撒泼讹诈，不需摔碎“名贵”瓷瓶，不需冒“撞车”也许伤身风险，最紧要的是看准目标，目标恰当便能大功告成，这是向祖上“以尸讹诈”这种高水平的碰瓷靠拢了。事实证明这的确有效，因而“从业者”众多，碰瓷已经成为了一个大行其道的行业。当今在中国这个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的世道，由于碰瓷敲诈猖獗，负责维持法纪的公、检、法机关又常常执法不严不公，导致诈骗者一再得手，受害者或好心救人者反复被“屈”，因此老百姓为求自保自卫，纷纷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有时甚至只好见死不救，造就了一个冷血的病态社会。

如此“国粹”，这些年也堂而皇之地步入国际舞台。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曾姓一家哭闹讹诈便是一例。还有一些是群体性的，手段更为“高大上”——包括呼口号、打国旗、唱

国歌，表现强国人绝不受辱决不罢休的英雄气概。这些美其名“维权”的碰瓷者，丑名远扬成为国际笑话，很让中国人跟着蒙羞，特别是住在世界各地华人的名声，多少也受到一些影响。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只在于此。

在这个事件中，中国驻瑞典桂大使也充当了一个角色。他维护曾家人，说什么瑞典“也”不讲人权，让大家感到他这个“也”字很精妙；他还说不能想象瑞典是诺贝尔奖国家，又让人联想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在监狱死亡。不过，比起来，桂大使讲话少许“失误”或可忽略，而让世人不能不斥责的是，他挑了曾家闹事上报做文章，真的闹出大动静了。曾姓一家哭闹讹诈发生在9月2日，中国有关当局9月15日才发声，于是明眼人明白，这是因为中间9月12日达赖喇嘛访问瑞典而中国外交阻挠未果，所以在9月15日发作，把一个民间小事件闹大到两国外交层次，成了一个轰动国际的所谓的“辱华”事件，借以“修理”瑞典一下。这是中国当局代表曾家在国际上洋碰瓷。

我们一些民族主义“爆棚”的中国人，常常兼具两种看似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满脑子“厉害了我的国”，趾高气扬，满世界以堂堂大国显摆，要主导世界，谁也招惹不得；一方面又脆弱得很，经不起任何不合意言行，包括玩笑、调侃、意见，非常敏感地觉得自己被侮辱，而且动不动就翻出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屈辱史”，把个人的事故上升到整个民族。总之，一方面很威风；一方面又太自卑，于是便出现种种所谓的“辱华”事件了。

现在，“Peng C”成了国际词条。“C”当然也可暗示大写的“China”，那就是指中国了。当C被诠释为China，当“Peng C”与“辱华”意思相连，当中国人成了避之则吉的刁民的代名词，当让华人自豪的黄皮肤黑眼睛成了世人眼中的异类，如果事情走到这个地步，那就真的太可悲了。

等哪天中国人抛弃“Peng C”这个太不光彩的“专利”，克服不正常的民族主义心态，不去计较别人辱华不辱华，中国才算真的强大起来。 

【何與懷评论】

如此国师：胡鞍钢成了众矢之的

何與懷

“抛常识于不顾，视学术为无物，实在有辱斯文。”

“上误国家决策，下惑黎民百姓，远引无数他国戒心，近发邻居恐惧。堪称误国误民！”

“其毒害深远矣！”

这些谴责文字，出自日前网上流传的一份呼吁书，是针对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博士及他发表的“中国综合国力已超出美国”的学术报告。这份呼吁书超过千名清华大学校友联署，呼吁该校校长邱勇先生，以母校声誉为重，解除胡鞍钢院长和教授职务。

千人联名要求解聘一名教授不管在世界各地都很罕见。而且，除了这份解聘呼吁书，报上网上包括官方媒体上还有不少批判胡博士的檄文。

这位近年来被称为“国师”的胡博士及他的“学术报告”，怎么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

其实，他这份报告早去年6月就已经发布。报告称，中国现今的六大实力发展，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时期。其中前三大实力早已超越美国。具体表现为：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经分别于2013年，2015年和2012年，“完成了对美国的超越”；“到2016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居世界第一”。除此之外，中国在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上加速赶超；国防实力明显提高，进入世界第二阵营；国际影响力居世界第二位；文化软实力相对美国差距明显缩小。总之，中国综合国力世界第一！

胡博士这个“中国超越美国论”，当时真是鼓舞人心啊！以前都是说说而已，这次可不是说着玩的，他提供了醒目的图表、各类数据和各种数字作为证据，最引入注目的数字当然还是年份，从2012年到2017年，中国就是在这五年里完成了对美国的超越，跃居世界第一，这可是新时代的第一个五年，意义不同凡响。根据胡博士辖下的清华国情研究院

官网，其主编的《国情报告》“先后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百余次，对国家重大决策产生持续影响”，可见他这个“国师”非同小可。事实的确如此。在他的影响之下，于是《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东西隆重登场。许多国人民族主义情绪极度膨胀，一时间，上上下下，人人变得锐不可当，傲视四海，热血沸腾，好像称霸世界的中国梦已经实现了。这是中国自1958年以来实行“赶英超美”战略的最大一针鸡血！只可惜，美国月前向中国发起了“贸易战”，《厉害了，我的国》惨遭下架，胡博士这个“超美论”变成了祸害“源头”。

胡博士是怎么样得出他这个结论，日前也被挖了出来。网上流传一则对胡鞍钢五分钟的采访视频。视频中，胡说：“我去过美国，我了解美国，我认识美国，我研究美国。你以为我就是中国国情专家？……包括前两天刚刚在网上发表的我那篇文章，关于综合国力超过美国，这不仅是需要科学研究，还需要勇气的。”采访者问，“新型超级大国”这个说法是否是他胡鞍钢首先提出来的？胡回答说：“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我觉得应该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就预言了，1956年有这么一段话，他是怎么预言的呢？50年，那就是2006年，或60年，2016年。我的做法，无非是验证它。”胡博士“验证”了伟大领袖的伟大预言。

其实，胡博士这种“验证”事业，已经从事多年，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最轰动一时的是他十年前提出的“九总统制”——当时中共中央是九个常委。他念念有词，“验证”说：九个常委就是九个总统，也可以称之为“集体总统”。人多力量大，智慧广，中国九个总统肯定比美国一个总统好。老百姓戏言“九龙治水”，到了他胡博士嘴里，却成了可以大吹大擂的“制度创新”。他讥讽美国的“两党制”和“总统制”愚蠢，全凭能言善辩，开空头支票；“三权分立”则是相互扯皮、相互拆台；整个政府组织结构松散，控制能力羸弱，向心力和决策智慧低下，一事无成……他宣称，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相比，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是现代国家制度典型的“后来者”和“创新者”，凸显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共产党是最有创新力的年轻政党”。

“九总统制”——那可是如雷贯耳的重大“理论创新”啊！按理说，这项党建理论的

重大成果，涉及党国领导制度的核心配置，如果成立，那毫无疑问真正是国师级的贡献，应该重奖。岂不料，风云突变，十八大后，已经有了核心，核心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此时再鼓吹集体领导，岂不就是要妄议中央，贬低核心？胡博士再也不敢冒着居心叵测的风险提他的“九总统制”理论了。

即使如此，胡博士还是有惊无险，还是如常搞他的“验证”伟业。今天，他怎么也想不到，他这个曾经为“四个自信”立下汗马功劳、极其鼓舞人心的“超美论”，突然之间变成“有辱斯文”，“误国误民”，“毒害深远”？他本来是掌上明珠，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负资产”？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胡博士一些陈年轶事，也被翻出。据说当年他还在社科院的时候，社科院内部有规定，研究报告如果总理有批示给8000元奖金，有一天胡拿着朱镕基的批示去院里要奖金，院长看后不同意给。原来朱的批示是“胡说八道”。胡说规定只要有总理批示就给钱，没说否定的不给，没办法，社科院给了8000元。同事们也记得，开会时他总要求先发言，发完言后，声称总理或某副总理约见自己，须先走一步。清华有一次校庆，朱镕基去该校，校方安排一些教授与总理座谈。挨到胡某发言时，朱镕基问道：原来你就是胡鞍钢啊，咱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吧，怎么外面一直传说你是我的高参呢？

不过，也有人“声援”胡博士。有人特列举如下数据，以证明中国的确是世界第一：日本行政费用占GDP的2.8%，美国占3.4%，中国占25.6%，是世界第一。看看中国巍峨高耸的政府大楼，美帝羞得都抬不起头。德国年人均工作时间是1400小时，美国是1610小时，中国则高达2200小时，也是世界第一。德国人均时薪30美元，美国约22美元，泰国4美元，中国0.8美元，又是世界第一，倒数。中国的社保缴费高达工资水平的40%，是日韩的4.6倍，北欧五国的3倍，中国的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64%，是商品本身价格的1.8倍，不是世界第一也是第二。

“声援”胡博士的人，其实真正是想说，胡某有他研究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应该是对所有的学者和学术机构开放；决策者更不应该只看他单方面的研究结果。胡博士被讥讽“给

帝王唱赞歌”，但解聘他难道问题就解决了吗？胡博士代表的是什么？就是用学术论文的形式来“验证”党国领袖的伟大英明正确。这难道不是当今体制内的主流特征吗？本来，社科知识人的任务，就是研究和呈现社会真相，追求良知与正义，但是，如果朝廷要的不是真相而是统治，不是良知而是臣服，揭示真相就成了高风险的事业。当今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并非是个别教授学者在大肆作伪，附炎趋势之徒比比皆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直就是主流取向。这种现象，除了个人人品、学识和道德需要追问之外，是不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病态的人格，残缺的精神，迷乱的思想，需要做社会病理学分析，在这方面，胡鞍钢博士倒是的确可以作为一个绝佳标本。

人有病，患乎一人，制度有病，患乎一国。🔥

【何與懷评论】

“川普现象”与“历史的钟摆”

何與懷

“历史的钟摆”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永远讲不完，也难以讲清楚。但简而化之，讨论这个题目有些中国成语似乎可以使用，例如：“欲速则不达”与“物极必反”。英语谚语 Haste makes waste 和 Extremes meet 也有类似意思。

关于中国古代史，据历史大师说，只要懂得儒家 Confucianism、道家 Taoism、法家 Legalism，就会了解了。儒、道、法这三家，就像一个 pendulum（钟摆）一样，让中国历史就这样摆来摆去。战国时期很乱，法家统一天下，激进刚烈，到汉朝要休养生息。休养生息主要靠儒家。儒家温和，但时间长了后会滋生懒惰和腐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敌入侵了，竹林七贤就跑到森林里，信仰起道教来。后来隋文帝很快以法家治国，强大起来。唐朝的时候又大致回到儒家及道家的路上。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亦是如此，一松一紧，一时一样。甚至非常不幸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在这方面也留下一句名言：一时左一

时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所以，中国并非古怪，有时候宽松，有时候收紧，很正常的，这是不断循环的历史进程。

再放眼西方，在历史上，存在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或理性-非理性之间的摆动。在苏格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揭示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方式后，世界经济的发展，由维多利亚时期的放任自由，到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高举“看得见的手”。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根与撒切尔强调市场自由，让“看不见的手”自主运行。在这两只手轮流主导的背后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摆动。强调公平，政府出面干预；侧重效率，让市场去配置资源。这样的摆动还涉及到社会与资本双方的利益关系，要求公平，侧重社会民生；效率至上，则资本获利更多。与之相关，强调市场因素，排除政府干预，于是小政府；而政府干预，则通往大政府。

为什么会有“钟摆”？许多学者专家都说了，从客观的角度看，在于钟摆所涉及事物本身的复杂性。粗略地看，事物都可以认为由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组成，譬如“阴阳”，在“太阳”和“太阴”之间形成某种谱系。这两个方面在第三方即语境的影响下，在谱系的两端之间摆动。这正是物极必反，两极相通。许多人不是提倡“中庸”吗？但谈何容易？要是真的不偏不倚，事物实际上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而从主观层面看，大致有三个因素。一是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洞察一切。在“一方面”占优甚至压倒性优势之时，强光之下，之外的一切几乎都处于绝对的黑暗之中。然而，实际上，那“另一方面”正在黑暗中酝酿，壮大。另外，一旦发现问题而着手纠正了，实践的效果却往往滞后，奏效有待时日，系统还是因惯性而继续偏离平衡点。还有，在回摆之时，在喜新厌旧和逆反心理左右之下，往往矫枉过正，所谓“不过正不能矫枉”。

钟摆还有层次。专家告诉我们，在自然界，最低层次的钟摆或许是基本粒子的热运动，随机涨落。在人类社会，人心始终处于两难的纠结之中：公与私，眼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物质与精神，“难得糊涂”与清醒……所谓“心静如水”，自我安慰罢了。逐级往上，钟摆越来越大。小的钟摆汇成大的钟摆，遂有“蝴蝶效应”，大的钟摆包含、制约、影响

小的钟摆。前者是“自组织”，后者是“他组织”。在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又有钟摆。在万物之上，还有宇宙的钟摆，膨胀与收缩。

然而，在钟摆的背后，历史并没有在原地踏步。专家提醒我们注意，有两个穿越时空和所有壁垒的主线：科技与人性。从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到蒸汽机、热机和电机，到 IT 和生物技术，再到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使历史的每一次钟摆较之以往都有所不同。人性同样。即使“退一步”，也酝酿着而后的“进两步”。正是在科技与人性这两个因素的推动下，历史一次次的震荡得以摆脱惯性回归力而逐步远离平衡点，在新的状态下稳定下来。值得引起警觉的是，在某种意义上，人性的主线往往滞后于科技的主线，这或许就是“文化滞后论”。在科技发展与人类进步的竞技场上，当国家、民族等各种群体左顾右盼冲突不已摇摆不定之时，科技却一往无前。比尔·盖茨有言道，技术是从来不会等待人们准备好之后才发明出来，人类只是随后跟上。这又是一个钟摆。接下来是人工智能，人类是否还跟得上？人类文明的未来在哪里？未来的文明是什么样的？人类文明如何延续？专家真是很耸人听闻却又如实地警告说：“奇点人”正在敲门。

这样慢慢说起来，“历史的钟摆”其实非常复杂。在历史的时空中，存在大大小小的无数的“钟”，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的人性的；“摆”也是各种各样，大幅度小幅度，或强或弱，而且互相纠结，有的互冲，有的互推，有的正面，有的侧面……不过，这都说得太远了，甚至已经超乎我们凡人的认知能力了。

让我们现实一点。就只是集中看看当今全世界特别中国极其关注的所谓“川普现象”及其与“历史的钟摆”的因果吧。

美国时间 2016 年 11 月 8 日，亿万富翁唐纳德·J·川普（Donald J. Trump）出人意料地击败被各种主流民调看好的前国务卿希拉莉·克林顿，当选第 45 任美国总统。川普赢了！全世界许多人，包括全部美国“白左”精英，甚至包括川普所在的共和党“建制派”人士，都大跌眼镜，都没有想到一个没有一点政治经验的商人居然会成为领导世界的美国的总统。许多人对这个所谓“川普现象”百思不得其解，或者，就是难以接受。

这是美国政治的一大“钟摆”。

人们探讨“川普现象”产生的深层社会背景，把时光拨回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个全美上下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该运动系统性地冲击了美国此前的政治与社会文化传统，并确立一整套新规范——这就是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原则。很快，它所衍生出的规范与禁忌超越了女权运动的范畴，延伸到构成美国政治正确原则主体的“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及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它们虽非法律，但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不成文法则。每个人，尤其是政客、名流，都在其凝视之下对一切言行进行自我审查。这些原则在一定历史背景下顺势而出，是有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促进社会公平的积极意义。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事实证明，“政治正确”很像中国传统上的“以德治国”，即搞一套道德标准，凌驾于法律之上。长此以往，这种走向极端和偏执的特定原则及其衍生出的庞大禁忌系统，明显侵害公民自由发表观点的权利，损害、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创造力、自我反思和改革的能力，对整个国家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钟摆”到了这个极限，川普适时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竞选口号，大胆突破“政治正确”的禁锢，坦率地表达了美国民众特别是美国白人劳工阶层的心声，结果就这样开辟了历史新的一页。

美国政治这个“钟摆”，不能不又强烈地影响了美中关系的“钟摆”。

川普一当选，许多中国智囊包括受其影响的领导人心中窃喜，视之为中国崛起的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战略机遇”——商人川普，这个中国官媒所调侃的“弄假成真的民粹主义偶像”，可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上因而会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一位智囊以难掩的喜悦心情这样“赞扬”川普：

“其实，弄明白美国的状况也许就不难理解川普现象了。美国的现状就是实力大减，快要没有能力领导世界了，到了需要改变美国的对外关系了。但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美国建制派并没有看清这个现实，而局外人川普却看清了，他的主张符合了美国的现实所以

当选了。”（朱志宏，《特朗普的新孤立主义与中国的挑战和机遇》，《战略观察家》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8年6月23日转发。）

中国智囊对其认为的川普“不得不走上”的战略收缩的“新孤立主义”之路作出逐条分析：其一，政治上，不再推销美国的价值观，不再追求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一切从美国利益出发，抛弃政治正确，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其二，经济上，尽力恢复美国制造业，提升美国经济；退出对美国不利的多边协议，利用美国的优势地位以与其它国家展开一对一的谈判策略，各个击破争取美国的最大利益。其三，军事上，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但不过多消耗美国的财力。只对对手施以高压，但不轻易卷入消耗大的军事行动中。其四，策略上，以最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利益。为此，不惜出尔反尔，甚至不惜不择手段地消耗对手实力的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点带有川普个人的特色。美国可能得到了很多实惠，但国际信誉和领导力下降。

中国智囊自然最感兴趣的是，在这种“美国优先”的新孤立主义战略指导下，美国会对中国采取什么举措？他们的推测是：川普会顶住各种压力，不与中国开打贸易战。即便开打，也会想方设法将之停止，因为中国有制约美国的杀手锏，这就是十四亿人口的大市场。美国一旦丢掉这个大市场，将加速衰落。

中国智囊还从大历史角度作了“深度”分析。回顾历史，美国曾经面临了三个对手，分别是德国、日本、苏联。这三个对手都是在制造业没有到达美国的70%的时候，被美国整趴下的。如果美国在2001年或2003年能够避免其中一场战争，集中力量全面打压中国，把中国整趴下的可能性非常大。那时美国不仅国力强盛，而且威望很高，可以说在国际上一呼百应；而中国却是制造业还没有起来，军事工业很落后，在国际上没有多少影响力。为什么美国没有及时把中国整趴下呢？关键是美国战略上做出了误判。翻开美国于上个世纪末制定的全球战略，在中国一栏的结语中赫然写道：中国并非全球性国家，而是地区性国家。这真是上天眷顾——中国趁机崛起了。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年中国的制造业总量超过了美国。这样，美国错过了的时机便永远错过了；而中国，

现在更可以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收缩，扩大其影响力，在全球逐步取得压倒美国的优势。

（见朱志宏，同上。）

然而，现在看来，是轮到中国智囊及其领导者作出过于乐观且非常危险的战略误判了。今年最近几个月以来，川普政府向中国发起贸易战并让战火越演越烈。这个看似“突如其来”的态势，让中国许多人完全没有预料到。而这个“出乎意料”其实就是出乎一开始的对川普当选后中美关系走向的完全南辕北辙的误判。在一些有所感触并自行反省的中国精英中，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算是其中一个。今年5月13日，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三届年会（2018年）上，他在发言中对中美关系的剧变做了这样相当令人震撼也令人深思的归纳：

第一，李行长说，他们从美国有关人士获得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美关系不会沿着过去四十年所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即使是美国的知华派、友华派，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美国国内无论什么党派，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什么阶层，是白领还是蓝领，他们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的态度，尽管他们的目的并不相同；

第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这两个文件他从头到尾仔细看过英文原版。它是美国政府、国会及民间各个方面整体对华态度的反映。从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专家现在已经不愿意站出来为中美关系说话了；

第四，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与美国的期望不符，认为中国是有意用军事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认为中国所确定的建立世界一流的军队的目标与中国的防务需求不符，指责中国试图建立与美国同样的全球军事存在；

第五，在意识形态上，美国过去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回到过去的模式上去了；

第六，在经贸问题上，美国认为中国故意拖延不解决美国的有关关切，口惠而实不至，所以华盛顿现在弥漫着对华失望情绪，逐渐失去了耐心的态度；

第七，美国认为，它的市场经济体制无法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竞争，因为中国的政府和国家强力介入市场，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WTO的原则，他们特别对“中国制造2025”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是政府主导，不是市场主导；

第八，美国的“一中”政策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内部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台湾旅行法》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反映。这说明美国国会和川普政府对“一中政策”的理解已经降到了原来的最低点；

第九，美国虽然没有说要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是如何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创建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体制，这是个难题。

这位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指出：“我们现在有不少报纸、新闻评论、专家学者都把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贸易问题或者是赤字问题，我认为这是个严重的误解。中美这次争端完全是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争议。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不符合美国的期望值，还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倒退。美国过去40年容忍了贸易不平衡，现在它认为中国和美国渐行渐远，无法再容忍了；他们对中国的这种‘非市场经济的竞争’表示了不满，认为中国现在做的一切是要取代美国的位置。”

如此看来，现今整个局势，绝非单个“川普现象”可以解释之。一些专家就这样认为：与其说“川普现象”不如说“习近平现象”，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是两者猛烈相撞而为。中国有些智囊又期望下次美国大选川普下台。然而，即使川普真的被下台，整个态势会扭转吗？看来又是一个误判。

的确，自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糟糕。专家们还认为，今年11月习近平、川普预计将会两次在全球峰会上见面，如果届时双方未能达成某种协议，未来数年甚至会更糟。已经被美中两国学者讨论了无数次的“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在贸易战的硝烟中，已经清晰可见。

在可见的未来，“历史的钟摆”将会出现何种状况？让我们拭目以待。🔥

【述 往】

一个地主崽的一生（三）

——儿女的求学与父亲的药担

韦文德

—

1955年的冬天，我们家终于搬到三都街上安顿下来了。过了年学校开学了，二姐、三哥上学就方便多了。早上起来尽管没有早餐可吃，但走几分钟就到了学校，中午放学可以回家吃饭。晚上放学回家，吃完饭后可以从容的做作业或温习功课，她们的学习成绩就更加好了。特别是三哥，尽管是先天的高度近视，但却是非常的刻苦好学，每天吃完晚饭，就低着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几乎是伏在书本上看书，他的作文在班上从来都是第一，很得老师的赏识。他的班主任经常来家访，所以对我们家的情况非常熟悉。老师经常勉励母亲：“你的几个孩子都很聪明，无论再苦再穷，都要想办法供他们读书，以后他们会很有出息的。”母亲谨记着老师的勉励和预言，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曾经穷得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但是没有哪一个孩子因为没有学费而读不了书的。然而老师的预言，却仅仅成为母亲和我们心中美好的向往，而永远无法应验。老师们连自己以后的命运都无法预知。

街上的父老乡亲们接纳了我们，我们一家的生活有了新的开始。父亲以赶圩行医卖药为业。母亲则参加街上农业互助组劳动。

在当时的农村没有医院没有诊所，主要依赖于民间医生。而民间医生所秉承的医术，就是传统的中医药，和当地民族民间医术、民族疗法，和就地取材的原生中草药的应用。当时人们对西医还不了解，相比之下，民间草医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成本最低，诊疗费最便宜，且效果也有其独到之处。所以父亲这一行还是有一定的市场，赖以维持生计和孩子们的学业，还是勉为其难的。

父亲以一担草药从三都—拉堡—成团—三都的循环往复着，赶完这圩赶那圩，从不间

断。只有在缺药时，就停下一天，回老家山里采药。每逢三都圩日的头天晚上，父亲就会从赶回家，以便明天趁早在家门口做生意。一早起来父亲就叫着我和他一起，扛着长板凳和床板，到梁姨妈家前门的骑楼下摆好药摊子。夏天时就叫我在药摊边摆张小饭桌，几个茶杯一个白瓷壶，顺带着卖山楂茶，一分钱一杯。大热天也能卖个一毛两毛的。同时还可以看着父亲帮人治病，跑前跑后的帮递递东西捡捡药的，到散圩时帮父亲收收摊，就可以得到一两颗一分钱一颗的水菓糖的奖赏。到散圩时，父亲还会去肉摊上买人家卖剩的猪肠牛杂等便宜货，一家人可以解解馋。

每个圩日都会有个把几个腰腿风湿、胳膊疼痛的来找父亲诊治。父亲就把个破碗片敲成三角尖儿，尖利尖利的，用药酒泡过消毒后，就往病人痛的地方扎两三个小口子，随后就拔火罐放血。拔出乌黑的毒血后，就在拔火罐留下的，乌黑圆形的血痕处搽药酒，边搽边拍，搽到最后时，就响响地“啪、啪、啪”的拍三下，口中念着“药到病除，好了！”之后，叫病人起来活动活动，病人一般都会起来扭扭腰、伸伸胳膊踢踢腿，检验一下效果，然后高兴的说：“真的舒服多了，不痛了。”父亲就给他们抓药，一包泡酒，三包煎水熏洗。泡酒药是五毛一包，其他就三毛一包，总共也就一块多钱。父亲总要交待他们用完药后，再来复诊，再抓包药巩固一下疗效就算治好了。父亲这样给人治病，靠的是自己的劳力和医术，药是自己上山采的，不用成本。所以治个病花不了多少钱，而且那时一块钱能买几斤米呢，父亲行医卖药的收入，也就够我们几姊妹兄弟交学费了。还可以解决家里生活所需的油盐酱醋和日常的蔬菜，不时的还可以改善一下生活，过年过节的还有鸡有肉和白米干饭，可以饱吃一顿。母亲在互助组劳动分的粮食，也可以维持一家一日两餐稀饭的食用。这样的生活比起在老家的刀耕火种，披荆斩棘的劳作要舒服得多了。我们一家人都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舒心和满足。

二

父亲的医术还是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对于某些疾病的疗法和某些药材的应用上，都

有其独到之处，也还是有些神效的。例如他以“走马胎”和“血党”配伍辅以“当归”行血，治月经不调，妇女不孕等妇科疾病是屡有奇效的，所以在县内多处乡镇，都有经他治愈而喜得子女的妇女，感于他的再造，而提着鸡鸭蛋酒来认契爷，我们也就平添了几个这样的契姐。过年过节的少不了一些孝敬的礼物。在之后我们处于危难的时期里，走投无路时，这些契姐们也都表现出了诚挚的亲情，体现了人性的善良。

在那种年代，小儿惊风是父母们最为担心的小儿急性多发病，父亲用长在崖壁北面的岩缝里的“羊蹄风”的肉根，嚼碎了敷在小儿的脑门上，只需片刻便止住了哭闹而安然入睡。醒来就病态全除。不可不谓功效神奇。本街邻里不少小孩子得到过救治，转危为安。

由于人们对饮食卫生不是那么讲究，痢疾腹泻的疾病时有发生，来找到父亲，父亲从不推延，立马到田边地头扯一把“叶下珠”或是“含珠草”，视病情而定，教病人如何用法，常常是药到病除。似这种小病痛的，用些独门单方就可以治好的，父亲从来不提要钱。特别是本街邻里。有些病人出于旧观念和习俗，认为求医不给钱怕药不灵验，非给不可，父亲也只好收一点做做意思，以免病人心不安而造成心理疗效不佳。为医者是懂得心理治疗的重要作用的。有些不懂医道的人，可能指斥这是医者的虚伪，那是一种偏见和无知。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以畸形的政治偏激去人为的扭曲了人和人之间善良的本性，人为地制造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并冠之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唯恐天下不乱。在不久以后的岁月里，当父亲的行医不得不转入地下时，对于某些人来求医，实在是处于两难的境地，是医也不是，不医也不是。医了怕给人抓住把柄，不医时又怕得罪他会遭受报复。就是医了也还是两难，收钱怕得罪他，不收钱又怕说成糖衣炮弹、收买腐蚀，而冒这个风险本来是为了弄一点油盐钱，有时就不得不横下心来，横竖都是一刀。

父亲照常的挑着他的药担子，今天赶这个圩明天赶那个圩，有时回家有时不回家。母亲每天晚上吃完饭，就牵着我到那些伯娘叔婶大嫂们家里说笑摆古。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她摆起刘三姐和七仙女的故事时，却是极为生动感人的。刘三姐的故事还没有编成歌剧、拍成电影广泛流传之前，我就已经是经常趴在母亲的腿上，听着刘三姐的故事，或是

听母亲唱着刘三姐的山歌睡着的。女人们在一起难免不时的开个女人们常开的玩笑，引起哄堂大笑时，我也禁不住地懵懵懂懂的跟着笑，这时大婶大嫂们就会逗我、笑我：“小娃仔懂什么，大人笑你也笑，人家这里都是女人，你个男人家来这里干什么？”这时母亲就会轻轻地，拍着我伏在她腿上的头，不无慈爱的说：“满仔爱跟娘嘛！睡啦、睡啦。”每次都是睡着给母亲背着回家，朦朦胧胧的伏在母亲的背上，耳朵里响着母亲匀匀的心跳声。感觉是那样安祥那么惬意。

三

到了一九五七年，三姐已经九岁了，中心小学出了招生广告，家里准备给三姐去报名上学，却还没有给我上学的打算。三姐去报名，我也跟三姐去看热闹。排队到三姐了，我就在三姐旁边，考试的老师正好是三哥的班主任韦炳端老师，他去家访时都认得我们。当他考完三姐后，我们正准备走，他就拉着我的手问：“你不想读书吗？为什么不报名？”我说：“我爹说要再大一点才给读书。”他就问：“你几岁了？”我答说：“六岁了。”他说：“年龄够了，你想不想读书？”我说：“想。”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就说还没有学名。老师说：“我帮你起名好不好？”我应道：“好啊！”于是老师说：“你几个哥哥叫文斐、文学、文武，有文有武还要有德，你就叫文德吧，好吗？”我高兴的唯恐怕被别人抢去一样，迫不及待地答道：“好啊！好啊！”老师就让我数数。我从一数到了一百，远远超过要求的标准，老师高兴的说好。接着老师例行程序的问我：“你家什么阶级成份？”我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不待我回答，老师就对我说：“你们家的成分是地主。”并且写在报名表上后对我说：“好了，你可以回去等张榜了。”我就和三姐退到教室外面，仍然在窗口边继续看别人报名。

其实，在老师问到我的家庭成分时，我是知道我家的成份是地主的，而且隐约知道，地主成分是不光彩的，所以我不愿让人知道，我特别不乐意自己告诉别人我是地主仔，也

不知道对老师是必须如实说的，所以就下意识地支吾了一阵子。当时像我一般大的孩子们对“阶级成分”的含义是不太明白的。正如街上的一个小伙伴，他的小名叫“阶级”，他家姓刘，报名时老师问他家什么阶级成份时，他就答非所问的说：“我叫刘阶级。”引起在场的老师们都禁不住的哄堂大笑。这个故事一直到现在，街上和我一般年纪的人都还记得清清楚楚。这个“阶级成分”从我的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成为我心中沉重的包袱。我害怕每学期开学的注册报名和填表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让我在同学面前感到尴尬，感到自惭形秽、低人一等。特别是渐渐长大，渐渐有了思想、有了自尊以后尤为如此。

快开学了，学校在三角地张贴了新生榜，公布了新生名单，老师给我起的名字排在第二十六班，三姐的名字被排在第二十七班。看了榜，我心中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的第一个班主任老师，是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李国贞。从她当时那令农村姑娘打心眼里羡慕的一身穿着打扮，看出她是个城市姑娘。但是，她对我们这些农村小学生的慈爱和关怀，是我的记忆中留下的，作为“老师”的可亲可敬的最好形象代表。关于她怎样给我们上课，怎样教我们读书已经没有印象了，但是，她从几里外的野营地，把一个生病的学生象亲弟弟一样，汗流浹背地背回学校的情形，在我心中刻下了一生一世都难以磨灭的“老师”的印象。每当我回首学生时代的生活，对老师的可亲可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而李老师总是作为“老师”的形象代表，第一个出现在我的记忆中。使我一生对老师怀着崇敬和感恩之心。虽然在之后那是非颠倒的年代里，我也曾因一时的狂热和无知，伤害过我的老师，使我感到深深地自责，有幸的是，在事隔三十多年后，我终于还有机会在同学聚会时，当面向老师道声“对不起老师”。

毛主席、共产党是我从课本中最早学到的词。我最初的理解认为，毛主席、共产党是两个人的名字。老师总是以崇敬的表情给我们解读这两个词，随后伴之学到的是救星、太阳、翻身、解放、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仇恨、反抗、斗争、推翻、报仇雪恨、革命、阶级、阶级斗争、阶级立场、忆苦思甜等等词汇。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跟随着这些，饱含着政治含义的词汇的不断出现，不断升级，反复的诵读，反复的听写、默写、造句、

作文而成长起来的。我们的成长是那么的快速，以致于使得我们过早地失去了稚嫩和童贞。在我童年的有限的天真和欢乐中，总是夹带着酸涩、尴尬和自卑。童年的所有单纯、温馨、和谐与美好是那么短暂，消逝得那么的迅速。甚至于让人来不及回味、留恋。🔥

【述 往】

独酌翁杂忆

——右派分子老王头·头号走资派

梁沪生

右派分子老王头

吾辈晚生多年，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之时，尚是唱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小学生一枚。彼时完全不省世事，从报纸上知道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这些“臭名昭著”的名字，承蒙灌输，印象里的右派分子个个都是张牙舞爪，挥着刀要杀人的妖魔鬼怪。

真正认识一个右派分子，已是多年后我18岁进了工厂的时候了。那是经过三年自然灾害（正确说是人为灾害）国民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下了马的工厂重新上马，修建了新厂房安装了新机器。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一切都感到新鲜。等不及分下车间进班组，就独自进车间去逛。

新设备已经安装就绪，安装师傅们正在测试。我盯着挂在车弄上方的轨道模样的东西好奇地问一个推工具车路过的师傅：“老师傅，这是干什么用的？”

被问的是个胡子拉碴的中年汉子。他简略地告诉我这是把棉卷从上道工序运到本工序来的空中轨道，便推车而去。

一个女干部模样的人（后来知道她是车间工会主席）正好走来，指那人的背影问我：“你刚才叫他什么？”

“老师傅啊。”确实，那汉子与穿着满身油渍工装的其他师傅并无二致。

“不要乱喊！”那女干部严肃且严厉，“你们年轻人要擦亮眼睛，他不是老师傅，他是右派分子。”

她扬长而去，我愣了好一阵。过一会儿，那个伪装成工人师傅的右派分子又推车过来了，我赶紧逃之夭夭。

工厂要正式开工了，进了班组。车间开会，女工会主席来传达什么重要的中央文件，环顾会场，杏眼一瞪：“王X X！你不能听这个文件，可以走了！”于是看见那个伪装成工人师傅的右派分子起身垂头离开了会场。

会后，女工会主席又留下新工人进行教育。她特别指出在我们工人阶级队伍里也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也有阶级异己分子。比如说在你们甲班，就有一个坏分子刘X X，一个右派分子王X X，他们是在这里劳动改造的，大家要警惕，不仅不要被拉拢腐蚀，还要时时注意监督他们。

自此开始上班，那个右派分子老王头果然跟我在一个班。相遇时他似乎还记得我们的一面之缘，似笑非笑地朝我点点头。我故作不见与他擦身而过。更多的时候是尽量不跟他面对面，见他过来，在车弄里绕道而行。他平时总是不言不语，兢兢业业地埋头干活，一般不跟别人说话。下了班政治学习之后，便匆匆而去。有几次下班后我们沿着沙河边到建设路看电影或打平伙吃饭，都看见他背着一个几岁的小女孩儿走在前面，进了沙河边的工人医院。

同在车间一个班组，打交道终归难免。他干的是普工的活儿，叫做推卷工，正是把上道工序做好的棉卷装在推卷车上推到本车间，一个个举到梳棉机后的架子上。这

是个体力活儿，以他的一米七以上的个头体格还是能胜任的。这天他径自朝我走来，告诉我某排某号机器出了故障。我是检修工，这是我的职责。

修完机器，我到车间门口小歇。一掏兜，想起香烟放在工具柜里了。右派老王忙完一轮作业也出来抽烟，正好看见，顺手向我递过来一支。我犹豫片刻，终因阶级立场不够坚定，把手伸出去——第一次接受了“阶级敌人”的腐蚀。

有了第一次，此后便是没完没了。不止我一个，其他几个一起进车间的师兄弟，一见老王头掏烟便喊着“老王头下雨罗！”（下雨即散烟之意）蜂拥而上伸出手来，主动要求被腐蚀。老王头也不吝啬，来者不拒见人有份，直到只剩下空烟盒为止。

有入党积极分子看在眼里，打小报告。轻工厅下来搞四清运动的工作队和车间党支部对此很是重视，敏锐地发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当右派分子腐蚀青年工人的典型来抓。

不料此项阶级斗争尚在运筹之中，四清工作队和车间的领导们就先被批判了。文革来了，四清工作队和车间的领导们一起被造反的革命群众挂着牌子，低着头接受批判。批判四清工作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车间书记和主任对工人进行管卡压。批判他们的时候，老王头等右派、坏分子一类，也会被弄到台上陪同。相比那些一脸惶恐、认罪不迭的领导们，老王头毫无表情，神态淡然，若无其事。不愧老“运动员”。

此后多年折腾，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台上被批判的对象不断更换，唯一不换的是老王头，永远是陪绑的角色。只有一次，终于成了主角。

数年一起在车间摸爬滚打，大家也对右派分子失去了警惕性。工余歇息时也坐在一起抽烟摆摆龙门阵。有一次只有我和老王头两人，点上烟后便问了他一个藏在心里很久的问题：

“听说你从前是轻工厅的干部？怎么就成了右派的？是在大鸣大放的时候给领导提了意见？”

他摇摇头，叹了口气：“唉，一言难进尽……”

在我的一再敦促下，他才低声道出了原委：那时候，他老实巴交，既没有疯狂向党进攻，也没有给领导提过意见。只不过……只不过在领导们按指标确定右派名单的时候，刚出世不久的女儿得了急病，他请了假带女儿去看病，就得到了一个右派名额。

我们那时候最恨最讨厌的就是告密者。我们把告密者称之为屁爬虫。没想到老王头在把这往事告诉我的时候，不远处就趴着这样一只屁爬虫。他假装睡觉把一切听入耳中，又加盐加醋告到领导那里。那时候正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老王头“右派想翻案”正好给运动送来了现实的活靶子。老王头这回终于站到了被批判的台子中央，成了主角。

被折腾累了，此时的人们已经不再把这当回事，批判会也就嘻嘻哈哈走了一个过场。那只告密的屁爬虫之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就像一只人人喊打得过街耗子，好长一段时间都处在车间工友们鄙夷的众目睽睽之下。

上面又开始提倡干部下放车间劳动。我们班组下来了一个政治部的副主任老许。我发现不知为何，老许和老王头在工余时间经常凑到一起嘀嘀咕咕。我和这个老许有过几次交道，可以开开玩笑，就拦着他说：“好啊，老干部跟右派分子在一起密谋什么？要翻天？”

老许正色告诉我：他和老王头是同病相怜，两人都有个十来岁的女儿，两个女儿都自小患了小儿麻痹症，不能独立行走。两人都为此操透了心。听说龙泉驿有个老中医擅治此症，两人正商量着是否结伴前往为女儿治疗。从老许口中我又得知：当年老王头因带女儿看病而当了右派，当了右派后不能照顾女儿又延误了治疗。此后，我们果然经常看见老王头和老许在周末背着自己的女儿，登上前往龙泉驿的公交车……

看过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在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几千名因言获罪的人们，如何被迫劳教或劳改的故事。相比那些

死在夹边沟早已化为白骨的人们，老王头是否应该庆幸？

头号走资派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的说法，文革的头项任务就是斗，斗走资派。中国的头号走资派是刘少奇。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当时的传达是这样说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以充分证据查明：刘少奇是当年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1968年中共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我当时所在的工厂——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头号走资派叫王瑞。他的职务是厂党委书记、厂长。北京的红卫兵和中央机关革命群众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我们厂的革命造反派在生活区食堂外的篮球场批斗王瑞。

我们这批1964和1965年进厂的学徒工进厂不过一两年，一进厂就听说王厂长是个颇有点传奇色彩的角色：当年年方18就当区武工队的队长，而且是刘胡兰那个区的，而且刘胡兰就是因为掩护他而牺牲在阎锡山匪帮的铡刀之下的。后来随解放大军进川，22岁就当天全县的县委书记。再后来转战纺织工业战线，到重庆的610厂当厂长（是个老纺织厂，不知道为什么用番号），很多重庆老工人就是随他一起调到成都来建设新厂的。听有的老工人说，别看他过去是要炮火的（拿枪杆之谓），现在可是企业管理的内行，也不知是真是假。

我们进厂后先进行政治培训和技术培训，以为他会在培训大队期间来跟大家见见面做个报告什么的，却始终未能如愿。团支部书记去邀请他来给青年工人讲讲刘胡兰的英雄故事，给年轻人搞搞革命传统教育，据说也被他拒绝了。直到后来进了车间，

才得见他的尊容。

那天上班，我们几个徒弟在机器旁听师傅讲设备原理。师傅的目光突然转向远处。

“王厂长！”众人的目光唰地转到那个方向——

在大家的注目礼下，一个四十来岁穿灰色中山制服的瘦高个，独自一人从隔壁的併粗车间过来，又径自穿过我们车间的弄堂，对我们视若无睹，目不斜视擦身而过，朝前面的车间走去。

“这个样子的啊！”有人对他背影嘀咕道，话语中透着失望。

老实说是挺失望的。之前想象的武工队队长，应该象《平原游击队》郭振清扮演的那个双枪李向阳，跨骏马闯敌阵，二十响左右开弓，鬼子们应声而倒。而眼前这位，一张蜡黄色二指宽的脸，瘦得能被风刮倒的身板儿，无论如何也跟武工队队长挂不起来。再加上一副高高在上的倨傲的咯都咯吱不笑的官架子，心目中给的就是一个差评。

之后，只要是上早班，都能看见他从车间穿过。巡视车间，这大概是他每日上班的第一件功课。依然是一个人走，偶尔也看见车间主任或者书记，匆匆地迎上，点头哈腰地汇报着什么。而他却是脚步不停继续往前走，主任书记等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象条哈巴狗儿。

后来也听过他的一次报告，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他在台上照本宣科，人们在底下开小会。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龟儿一口醋酸溜溜的山西话，听都听球不懂。在台上的他似乎对下面的人们不关心国家大事很是恼怒，多次拍了桌子。岂知大家一关心起来，他就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首先就要把火烧他身上。在厂里他的官最大，自然是厂里的头号走资派。

批斗王瑞大会是在生活区食堂外的篮球场召开的。是由革命群众组织红旗战斗师、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棉分团组织的，声势颇为浩大。木板搭就的台子上挂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王瑞批斗大会”，四周贴满“彻底清算王瑞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王瑞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标语。王瑞为首的一

列厂领导无一例外挂着牌子，各被两名壮汉架着“坐飞机”，接受群众声讨批判。

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这是当时走资派们无人能免的共有罪行。除此之外，专属王瑞的重大罪行有二：

其一，“恶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攻”即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是要枪毙的重罪）。事实如下：革命群众请他讲刘胡兰英勇斗争壮烈牺牲的故事，他居然拒绝，居然说刘胡兰这丫头没什么好讲的，也就是毛主席给她提了词她才出了名。连毛主席都说刘胡兰“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他却如此态度，是可忍，孰不可忍！

其二，解放后他另择新欢，抛弃了糟糠之妻，娶了一个美貌的女干部（其实这有点大惊小怪，最大的头号走资派不也是这样的吗？）更有甚者，离婚后儿子判给前妻，他居然派厂团委书记到重庆把儿子偷到成都（有人说是团委书记主动向党委书记献媚之举），弄到自己身边。

批斗、关牛棚、劳动改造……这是当年大多领导干部必经之路，王瑞也是如此走过文革，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又重新当了厂长，依然是厂里说一不二的当权派。前面去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个定语。

当年我一个小工人，与当权者毫无交集。从吃瓜群众的角度，经历了文革，对此公的印象倒有些变化。其一，批斗他的时候，还象条汉子，拒不低头拒不认错，当时所谓顽固不化。这点倒还象当年武工队长那样的狠角色。不象有的软骨头干部，全然丧失人格，随形势变化不断充当变色龙角色，甚至不惜与得势者暗通款曲，捏造罪名构陷他人；其二，重新上台之后，没听说有对当初批斗他的人打击报复的行为。相反的例子举不胜举，厂里有个周姓的政治部主任，复上台后主持清理阶级队伍之类运动，变本加厉整治批斗过他的人。甚至因病临死前还对斗过他的人耿耿于怀，病榻上还录下这些人的姓名，将仇恨传之下一代。

八十年代中期某年，我出差北京，居然在成都双流机场的候机室看见了王瑞。此时他已高升省计工委主任。从不远处看去，他的气色气度都已非昔日可比，几名秘书随从之类的角色簇拥着他，从我面前经过，朝贵宾候机室走去……

【本刊聲明】

本 刊 聲 明

《記憶》創設於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間，面向業餘，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記憶》非慈善、非公益。編者盡義務，作者無稿酬。凡認同《記憶》宗旨，成為本刊會員，遵守本刊規定者，皆可獲得本刊。

《記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宗旨，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刊訓。遵奉眾生平等，百家爭鳴之精神，凡擺事實，講道理的文字，無論何門何派，皆可刊發。除特殊情況，本刊要求首發。所發文章，不代表編者觀點。

本刊所載的文字、照片、圖表等內容，均受國家法律和對中國適用之國際公約中有關著作權規定的保護。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任何人不得改編、轉載、複製或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獲得合法授權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必須為作者署名，注明“來源：《記憶》第 xx 期”字樣，並按有關國際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

違反上述聲明者，本刊將依法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聯繫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選摘、引用本刊文章，請注明出處

本期編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鄒 行